創刊號：

「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回顧

By coutersy of Yan Chi Vinci Chow

《編者的話》

今年是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的十周年。《思想香港》便以此為創刊號的主題。

十年前，香港人以集體的力量，踏上街頭，以群眾的力量制止了鉗制香港人自由和權利的「國安法」(23條)的立法，也間接促成了首任特首董建華的下台。此後，每年「七一」都成為香港公民動員的焦點活動，被看成香港後97政治的里程碑。2003年的「七一」，無可置疑是香港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轉變時刻。可是，十年之後的今日，香港仍處身政府認授性不足的危機，更又面對「泛民派」的分裂，中港矛盾也持續擴大，各種性質不盡相同的政治主張紛紛出現。

本期的四篇文章，節選自六月初在嶺南大學舉行的一個小型工作坊中，直接以「七一」為題的討論文章。這些文章分別以不同的角度回顧與檢討十年來的「七一」，當中既有個人經驗的回溯，也有歷史反思及宏觀社會趨勢的分析。它們以「七一」為焦點，但探討範圍也不限於「七一」。這幾篇文章旨趣相同，但立場與取徑卻未必全然一致，對未來及當下的判斷亦不盡相同。但無論如何，這幾篇文章都觸及香港在過去和當下的政治與文化格局下一些長期未有被認真處理的問題。這些問題，既是思想性的，也是關涉思想所由生的歷史及社會脈絡。這幾篇文章是疏理這些經驗的起步。

在每篇文章之後，我們還附上當日工作坊討論的一些回應和討論。而以其他題目為焦點的的文章，以及綜合討論的記錄，我們會在下一期刊登。

羅永生

目錄

題目	作者	頁數
七一的歷史和特質	馬國明	3
0371的前後	梁志遠	5
歷史不是我們創造的	馬國明	7
0371十週年，試檢視反對運動的三條思想主軸	陳景輝	8
0371是大集匯	張銳輝	11
警惕雅閣賓式的狂熱	陳景輝	13
綜合討論：		
以中時段思考七一	小西	15
給被壓迫者充權的人民歷史書寫	蒙兆達	16
反中產霸權	蘇耀昌	18
公民社會與虛擬自由主義的解體：兼論公民共和的後殖主體性	羅永生	19
香港的主體形構	谷淑美	27
主體性的歷史書寫	羅永生	29
公民社會的山間小徑－從虛擬邁向真實	李達寧	31
對0371運動影響存疑	葉寶琳	34
為解殖提供入手點	李達寧	37

《七一和歷史的特質》

文/馬國明[1]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參與人數高達五十萬人，第二日不少報章說：「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又或者說：「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歷史一向是統治者的歷史，像唐太宗李世民與哥哥爭奪皇位，先發制人，殺了已被冊封太子的哥哥建成和支持建成的弟弟元吉後，更進逼唐高祖李淵交出皇位。中國歷史卻輕描淡寫地把這段同室操戈，兄弟相殘的血腥事蹟寫作「玄武門之變」，跟中共說的「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一場政治風波」異曲同工，都是典型的統治者寫的歷史。如果說「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那麼這一段歷史和之前慣常由統治寫的歷史有甚麼明顯的分別？如果「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那麼香港市民還創造了甚麼歷史？

即使在統治者眼中，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亦有點不尋常。這一日原是香港主權移交的紀念日，但主權移交的講法是從舊的宗主國的立場出發；對中國大陸這個新的宗主國來說，香港從來是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如果香港曾經短暫地從中國大陸的國土分了出去，那只不過是當年統治中國大陸的清朝政府喪權辱國的事例而已。從中國大陸的立場而言，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主權，正式結束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七月一日這個日子要紀念的便也是結束百年屈辱這件天大的事，為了紀念這件天大的事件，有關當局分別在灣仔和大埔豎起「回歸紀念碑」和「回歸紀念塔」。

歷史的字眼十分奧妙，也極之詭譎；七月一日既是「主權移交」，也是「收回主權」，更是「回歸祖國」。「主權移交」說的是英國把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大陸，「收回主權」當然是說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主權。至於「回歸祖國」說的則有如偶然舉辦的「行路返廣州」般，是香港重投「祖國」的懷抱。從事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大多認為歷史是一門客觀和科學的學科，歷史研究必須本著科學精神，以事實為依歸。歷史學家的見解毋須置疑，歷史學家的努力更值得尊重，但歷史不但是歷史學家們的客觀和科學的歷史，更往往是統治者為了鞏固其政權而建構的一套論述。若以客觀為準則，「主權移交」的說法最可取。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當日，英國的查理斯王子專誠到香港代表英國主持主權移交的儀式，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收回主權」的說法說出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意願，同是合符事實。「回歸祖國」的說法除了染上濃濃的感情色素之餘，還帶著幾分含糊和曖昧。「回歸祖國」這種說法明顯忽視了在上個世紀的整個八十年代裡，當中國大陸清楚無誤地表達了收回香港的意願之後，香港社會一直被焦慮籠罩著的事實。

在整個八十年代裡，有人選擇移民，有人一廂情願地遊說中國的領導人收回香港的主權，但治權卻仍舊由港英政府管有。「行路上廣州」般的「回歸祖國」絕對不是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客觀描述，但這個不客觀的說法卻是官方對七一的稱號，除了「回歸紀念碑」和「回歸紀念塔」之外，更有「回歸紀念日」和「回歸十周年慶典」等官方採用的字眼。「收回主權」的含意可以包括中國大陸妄顧香港市民的意願，霸王硬上弓般的收回香港。相反「回歸祖國」卻是香港重投偉大祖國的懷抱，既溫馨又感人，完全沒有任何負面意義，統治者當然樂於採用。客觀科學嗎？統治者的歷史講求的是方便，不是客觀科學。

六四事件最能夠說明統治者對待歷史那種「不問好醜，但求就手」的取態。六四事件發生於二十多年前，當年的死傷者究竟有多少，他們姓甚名誰？對於這些問題，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一直諱莫如深，既沒有負起一個政府的起碼責任，查清楚有多少國民在事件中死傷；更阻撓「天安門母親」這個民間自發的組織調查和發佈死傷者的名單。標榜客觀科學的歷史學家們必須明白，當堅持要追查真相的「天安門母親」一個接一個的老死之後，當所有在六四中死

[1] 馬國明：經營樓上書屋曙光圖書公司22年，現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課程兼 任講師，同時擔任網上雜誌<<文化研究@嶺南>>總編輯。著有<<班雅明>>，<<路邊政 治經濟學>>，<<全面都市化社會>>和預計2013年聖誕節前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歐洲12國16 天遊>>。

去的年輕生命的父母們都相繼離世時，六四死難者的確實數目這一簡單的事實便永遠不可能知道。在統治者的強權和專橫下，歷史的真相有可能永遠隱沒。六四二十周年的維園燭光晚會參與的人數雖然有爭議，但人數之多是歷年之冠。除了維園的燭光晚會，紀念六四的活動還包括詩歌朗讀、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世代的聚會和對談等，報章上的討論文章更是百花齊放。出席集會和撰寫文章的都逼切地感到經過二十多年後，當年血腥鎮壓、手上仍沾著鮮血的統治者依舊是歷史舞台上的勝利者，即使是死去的人仍無法獲得安全。死去的已失去寶貴的生命，但當歷史的勝利者繼續是勝利者，甚至像秦始皇的想像般，其後代千秋萬代的一直統治下去時，死去的更會永遠從歷史裡消失，他們恍似不曾在世上活過一天般。統治者的歷史不但不講求客觀科學，而且將受害者吞噬。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或是「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的歷史都不過是風中的殘燭。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方面便把它定調，強調香港市民是因為不滿經濟才會參加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一事則絕口不提。七一大遊行或許已寫進歷史，但這段歷史隨時會像「主權移交」或「收回主權」變成「回歸祖國」一樣，變成是一段對統治者有利，方便統治的歷史。事實上，自從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方面不斷放寬中國大陸各省市居民到香港旅遊的限制（即所謂「自由行」）。香港的旅遊業、零售業、餐飲業等均錄得可觀的增長。最近，剛貴為人大委員長的前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會見香港某建制組織時一再強調「發展經濟才是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空談」。對比張德江的見解，無論是「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或是「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等講法雖不至是空談，但顯然已無甚意義。沒有人會否認發展經濟的重要，不幸的是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由於北京方面把五十萬人的訴求定調為對經濟發展的不滿，因而推出多種優惠香港的措施，除了「自由行」之外，還有免關稅或撤除規限讓香港的貨物和服務業可以進入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即所謂CEPA），「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提法更令香港的金融業人士垂涎三尺。如果說「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那麼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方面所造的便是「官老爺才是一次又一次，歷久不衰地創造歷史」。這樣說不是要貶低七一大遊行的意義，而是要清楚知道歷史總是令人神傷的，因為只要回望歷史，歷史必定包含各種未兌現的承諾、未完成的希望，甚至是失落的希盼！2003年七一大遊行確曾帶來希盼，但十年之後，當年的希盼已大多被埋葬在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垃圾堆中。

《0371的前後》

評論：梁志遠[2]（標題為編輯所加）

今日的評論我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我在理解完馬老闆文章內容後, 作出自己的歸納, 提出一些重點。 我認為他這種整理歷史線索的努力, 本身已是值得我們去加以討論的。第二方面，由於馬老闆寫了這篇有關七一歷史的特質，對自己也很有啟發。對我而言，歷史本身就是充滿歧義的，那麼到底是由誰去發聲呢？我作為香港一個小市民可以補充的是，當我們每一個人也是歷史中的一個角色時, 我們又可以論說一個怎樣的歷史？在討論七一作為港人歷史這問題上，我是希望能做到如小西剛才所提到的一點，即把歷史的討論儘量再向前延申一點。也由於這篇文章的啟發，提醒了我要仔細想想六四對七一的影響。最後一點要申明的是，因為我的背景是做社會運動及理論之類的研究，而今次研討會比較是以文化研究的角度進行分析的，所以我可能也幫不上什麼。但是當我們在處理動員理論上，也有一些以文化角度出發的相關概念，而這些正正是我一直想做，但一直未能做到的。就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是否能從這角度作一點推進。

先進入具體的文章內容。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有關歷史闡釋，以及運動與運動之間的關係。文章提出了兩種重要的論述。第一種是官方的、大陸政府的對七一的論述， 而另一種是民間的。在前者的論述裏，馬老闆嘗試把討論的時間點，提前至九七年的七月一日。事實上，我們在之前的好多討論會上，都有述及有關官方或特區政府對七一的回歸論述。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官方提到九七年七月一日要熱烈慶祝回歸的同時，官方也會立刻提出有關百年恥辱的問題。對這種說法，我是充滿疑問的。既然是百年恥辱，為何不一早把香港收回？我覺得這是那些論說者想說，但又永遠說不清楚的問題。由於這些過去已有好多人討論過了，我也不想在這一點上深究下去。但是這作為七一的一個論述，我認為這是一個基礎，或一個對象，也解釋了後來0371為何具有顛覆性。因為這種反抗，提供了對原來七一回歸慶祝論述的另外一個闡釋。而這亦是馬老闆在文中提到的，香港市民又一次從歷史裏創造了歷史。這裏要說的似乎是: 相對於官方的，民間自行創造了一次歷史。我覺得當中最有趣的是，一個有關「香港市民」這「統稱」的問題。究竟香港的歷史是一個怎樣的歷史？這一定是有異於官方的歷史，但是究竟對於「香港市民」這一集體來說，這歷史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歷史？「香港市民」這論述似有還無，但這歷史最終似乎還是因為這個抽象的統稱，而被確立了。在我們日後談及今天０３７１十週年時，這歷史就好似真的變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對新政府而言，0371十周年無疑是一個開始，而這也是九七回歸以後的香港民間社會的一個重要的起點。我覺得這些提出都十分重要。

接下來我想補充一下我的看法，以及提出一些有關我和這歷史上的一點關係。七一給我最深刻印象的，除了有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立法局議員於立法局大樓外的集會向群眾發言外，就是０３年以前的幾次請願，因為在1997至2002年，每年七一其實都是有抗議和請願的。我記得九七以後，九八年的七月一日也還是有抗議的，當時還未當議員的長毛也在內。那次有許多個民間團體參與抗議，最後有部份人被捕。假如我沒記錯的話，那時候的示威主題是以關注民生為主的。其實03年以前的七一遊行都是以關注民生為主的，政治問題則相對較少被提及。這是03年以前，每年的情況。但為什麼直至03年71就突然有了轉向呢？背後的原因我都記不清楚了。但是每年七一都是在不斷演變的。

另外一個原因，七一對自己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就是在那天出生的。因此每年生日我都需要去抗議，雖然也試過有人會在遊行後請我食大餐。但其實我都不太吃得下去，因為天氣太熱了。這好像是在說笑，但也正正注入了每個人的小歷史。從紀念我自己生日，推廣至紀念新香港的成立。我說是新香港，但其實這也是關係到我們說的是「誰的」，以及如何定義的問題。

---

[2] 梁志遠：現任香港理工大學專任導師。曾從事社區工作，關注宏觀社會工作及社區組織訓練,，致力研究社會運動,，小販政策及貧窮等問題。

究竟七一對香港人有什麼含義？我的意思當然是除了放假以外。我仍希望回到六四的議題上，我覺得有幾個日子是重要及適合大家要一起討論的。例如是八九六四，零三七一。我見到有八十後的朋友在座，所以也要提及反高鐵事件。當然最近的還有0371十週年，以及明年2014年的佔中。由八九開始, 我們多關注了內地的問題，至2003年，出現了一些本土大型的反對運動，這些似乎都與自我身份的把握有關。直至2008年, 我們又看到香港本土論述的建立，好像五年就會有一論，至今年或明年2014年, 又開始有人提出，想對本土發展的論述作出重奪及反擊。

我對這些歷史性的發展都是正面樂觀的，也認為這是向好及向著自主性的一個發展方向。還有一點必須要提及的是，究竟八九六四的廿四週年與零三七一十週年，兩者背後有沒有什麼關係？即是，那種歷史被紀念的意義在哪裏？這兩者的關係我覺得必須要花時間討論。最後，在社會行動理論中有一種文化理論，英文是framing theory。這理論提出了關於Master frame的問題，內容是有關每一階段的社會運動是受著一個宏大的文化論述所主導，從而帶領著某一時段的社會運動的軌跡。還有一個概念是叫作Cycle of Protest，這是一個線性的概念，解釋了有關社會運動的浪潮的起伏變化。後者是一個比較線性的討論，而前者是一個比較橫向的討論。兩個討論相加起來，我們便會有著一個既重視歷史發展，也重視歷史內容的分析架構。我未知這與文化研究有沒有關係，但它強調了每一個階段的社會運動，會累積至下一階段，並為之提供了怎樣的文化資源及限制？甚至是如何局限著下一階段社會運動的可能性？這些理論假若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深入探討一下。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歷史不是我們創造的》

回應：馬國明（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好簡單作回應。當我回顧0371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五十萬人大遊行，而是遊行後，香港的報紙媒體如何闡釋這一件大遊行的事。我在文章裏是這樣寫的，「香港市民又再一次創造歷史」。這句說話不是我所寫的，好像是《明報》的標題。然後，另一個標題是「七一寫進歷史」。這些媒體的闡釋，我覺得有點憑空。這一句「香港市民又再一次創造歷史」好像十分令人鼓舞，但事後發展卻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不久後，我們就聽到了有關北京方面的定調，主要因為市民是香港人，對經濟有所不滿。我不知我的記憶是否有錯，但我印象中這兩件事的相隔是十分的短。七一之後不久，就有一些消息傳出，指北京方面對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這件事的「定調」。這裏的「定調」是什麼呢？就是不關政治、不關民主訴求，廿三條也不是什麼主要，卻主要是對經濟上的不滿意。

接下來我們也能猜到的是，國內立刻大開水喉。大量的優惠措施推出，例如現在的自由行，及CEPA，還有讓香港金融界流口水的所謂「人民幣離岸中心」等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有段時間更容許國內人士購買香港股票。哇！十三億人來買香港股票，香港的股票行一定賺到盤滿砵滿，那些股票經紀一定笑得合不攏嘴。這些狀況都是顯然易見的。我特意提這例子是想說明，若我們回顧這一系列事情的後續發展，在七月二日的報紙標題提到「香港市民又再一次創造歷史」後，我們不期然想到這個標題是何等的愚笨！創造歷史？歷史是你創造的嗎？

昨天早上我聽收音機，這是我的習慣，我還會不時收聽李慧玲的節目。昨天她就提到現在中學沒有了中史科。然後有好多聽眾便打電話到節目發表意見。但是這些討論和意見不離以史為鑑。當中最令我吃不消的是，李慧玲有一句話是，「歷史是不斷重覆的！」正因為歷史不斷重覆，因此我們可以以史為鑑。如果不是不斷重覆，我們又如何可以以史為鑑呢？我聽到她這樣說，唯有不住地無奈搖頭。因為所謂以史為鑑的說法，純粹是針對皇帝而已。有位聽眾更打上去說《資治通鑑》。我對這些說法就只想說一句，「是不是有點愚笨了？」《資治通鑑》每說完一個歷史事件，最後都有一段司馬光的評述。而他每個評述都以「臣光曰」為開頭。他這些說話是對誰說呢？正如當我們向參與者自我介紹都不會自稱為臣，那是因為在這裏沒有皇帝。假如有皇帝，我們還可能這樣介紹。中國的二十四史，通通都是以皇帝為對象的。因為那些正史本來就是由皇帝下令，任命史官所寫的。但是這就引發出了我們對歷史的很大的誤解。歷史應該是從事件發生之後來理解的。

正如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大遊行之後，我們必須觀察事情的後續發展，方能理解這件事的意義或性質。我現在想，在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大遊行的十年之後，連同當時所發生的事，尤其北京方面所做的功夫，我們就知道0371大遊行絕非「香港市民又再一次創造歷史」。更應該反過來說，七一大遊行是迫使北京更加要去抓緊香港的歷史發展。這點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很清楚。五十萬人遊行又怎樣？只要北京願意大開水喉，香港人對什麼民主自由的追求都可以消失得蕩然無存。這就是我們香港的現實。儘管可能有點戚戚然，但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頭腦清醒。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0371十週年，試檢視反對運動的三條思想主軸》

文/陳景輝[3]

今年是0371十週年，筆者想從自己的社會運動經歷，疏理一下不同時期公民社會中反對運動的重點。

回想，我和這個城市的交匯處，是在近10年爆發的社會運動。

讓我自我介紹一下。2003年可說是我人生的分水嶺。那一年，我加入了一個因七一之後成立的組織「七一人民批」，參選區議會選舉，成了當時的最年輕候選人 。21歲的我，以七一新世代的面貌，成為部份媒體焦點，口齒不清的說著書中拿來的民主道理。

2005年，我經歷了韓國農民的反世貿示威，近距離見識到貨真價實的勇武鬥爭，吃了人生首次的水炮；接著在2006和2007，我們一代人發起天星皇后的保衛戰，高舉本土身份和直接行動的旗幟；2010年，則是八十後反高鐵運動，我們心繫著新界菜園村；去年，在反國教運動中也有幫手，有幸見識到90後網絡世代的運動方式。

我想把這10年的反對運動分成三條思想主軸，它們分別代表著三種解拆權力，形成反對觀念的思考途徑。

1. 頌揚差異的時代

2000年初，我開始參與社運，那都是一些跟多元身份認同有關的新社會運動，例如同志運動和青年運動。所謂社會運動，並不像今天般模糊不清，社運明確區別於純粹以普選和參選做為主要目標的政運。社會運動存在多元化戰線，人們也深知社會宰制來自於多個源頭(例如環境、性別和年齡，涉及不同的權力關係和價值系統)，並存在各式根深蒂固的歧視和排斥，凡此，並不靠一張選票可以克服。

以上的社會運動，有一重要信條，那就是崇尚差異與多元。老師經常提醒我們，很多社會裡的二元對立(例如同志vs異性戀)，它們其實不涉及高低之分(正常或病態)，而是純粹差異而矣。

同一時期，牛棚書院出現，很多文化人、知識分子和社運人也都在那裡交換進步的思想知識和主張。這時間，法國理論思潮影響我們很深，像是福柯的權力理論、李維史陀的結構人類學和羅蘭巴特的神話學，就算沒有真正讀過他們的著作，也會受他們所引發的思潮和傾向影響。像是李維史陀很有名的斷言，象徵較它所象徵的更為真實，這在我們一代人的批判意識中，播下了重視文化作用和符號效應的種子。

在此，我們一方面很著重流行文化、日常生活方面的文化批判，同一時間，對於解放(or出路)的了解，則是把目光放在主流之外的另類構想。這類構想通常來自人類學研究、其他地方或少數族群的個案經驗，倡議另類教育、另類經濟、多元情慾，等等等。

留意一點，這種批判追求的是邊緣、另類、差異、多元，而對主流並沒有取而代之的準備。

2. 強調本土和領導權

---

[3] 陳景輝：八十後社會運動核心成員，曾任香港數碼廣播電臺節目主持，評論文章散見於香港的報章雜誌，編有《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等著作。作者除了參與社會運動，平日嗜書成性，思想立場充滿「港毒」味道，在喜帖街、天星及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之後，沉迷於港產電影、本土反抗運動史、社區街道特色和香港六四記憶等問題的研究。」

2006和2007年，我們開啟了城市保衛戰。我們開展了圍繞本土身份和重構地方經驗為主的反對運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衝進天星碼頭之前的一個小研討會。

零六年底我們闖進天星碼頭,之後引發了許許多多圍繞歷史、空間和主體的本土論爭。但在之前,並沒有什麼人會把「本土」兩字掛在心上,甚至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恰巧行動前數天(當時尚未形成闖入的念頭),我們一班朋友參與了一場討論會,講者之一是馬國明。過百人擠在尖沙咀一個會議廳中,討論關於本土身份認同的問題。懷疑聲音此起彼伏,但我清楚記得馬國明如何地斬釘截鐵：「本土就是追認我們自己受壓迫的祖先、未完成的希望。」　在闖進天星、守護皇后的時間,我們幾個人--至少包括朱凱迪、周思中和我--惦記的就是這番說話。

另一個值得重提的是喜帖街運動。

大約零五年前後,我在灣仔一間社福機構掛單,當一個社區工作員。其時,爆發於灣仔老區大大小小的居民運動方興未艾,而運動方向本身又恰逢一場範式轉移。轉移什麼範式？簡單說,就是在運動方向上從強調「合理賠償」轉向「社區保衛」　的理路，並從根本上否定市建局用錢解決一切的賠償邏輯,然後肯定社區住民、網絡、文化及歷史的價值。

後來的天星皇后碼頭運動裡的本土觀念，就是從老社區承載的文化紋理、城市價值和生活智慧中生長出來。

這時候的反對運動，不再說那麼多另類、差異、邊緣、多元等觀念，比較強調一種本土地方認同，並企圖以一種新的全民觀念(「小區小店」、「天星碼頭的文物建築價值」和「六六年絕食反加價的本土抗爭傳統)所象徵的)替代舊香港的主流秩序(以地產霸權為象徵)。

補充，在天星皇后反高鐵運動中，當時的主流秩序相比今天強大得多（今天香港主流意識型態面臨更大危機）。因而，我們在考慮反對運動策略的時候，依然重視建立不同社會力量的聯盟，以及知道社會的主流意識根深蒂固，唯有通過各類象徵性社會運動(如苦行)，企圖轉化，而非自信可以立刻推翻。

3. 新近的轉向，立刻推翻的時代，或敵意失控的革命狂熱

近年，反對運動的蓬勃成長，當然綻放出推進社會的光明一面（例如90後引爆的反國教運動），但另一邊廂，也有其陰暗一面。

例如，以網絡為基地，活躍於政壇的政治激進派，便終日沉溺於「同路人危機」此一自製稻草人，不斷黨同伐異。網際網絡上，以民主之名發出的惡毒攻擊，層出不窮，甚麼左膠、飯民、大中華膠、佔領光環、賣港賊、雲端文化人或維穩社運等，數之不盡。

這就是我所謂的陰暗面，即：敵意，以其最本能的方式爆發，敵人的涵蓋範圍不斷擴大，不僅要打倒舊敵人(如建制派)，還將槍口對準所有溫和主義、路線不同者、以及任何對於社會變革，反應遲緩的人群、事物或惰性。政治，彷佛成了一樁只有敵人而沒有客觀限制的反對事業，籠罩在一股無根的革命狂熱之中。

在此，激進反對運動以一種雅閣賓式的革命人民話語，不斷爭奪能夠象徵「人民」的正當性。在此，一系列二元對立構成這種人民的象徵性：溫和 vs 激進；妥協 vs 原則；維穩 vs 抗爭；賣港 vs 本土 ；和理非非 vs 勇武，等等。每個對立中，前一項代表出賣人民，後一項才是能夠為人民說話的正式代表。

在此，所謂人民，只是一種純粹以原則價值和同一性構成的價值變形物，它失去了一切社會的實際內容。

4. 反對運動的貧乏

近年，我反覆思索的就是此一敵意失控和蔓延的現象，思想它到底出了甚麼毛病。

如果以前兩階段來對比，可說當下反對政治失去了尊重差異的能力，而且也再沒有耐性以霸權(hegemony)的邏緝分析主流秩序，我所謂霸權的邏輯，是基於對統治的了解，和關於建立歷史性反對聯盟的想像。

在上述革命狂熱所描繪的政治圖像中，人民已處於水深火熱，統治已失去所有正當性，建制秩序隨時倒下，只欠人民一次起義，送它一程。在此種圖像背後，預設了一個「簡化」的權力分析，其中，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就只剩下赤裸的權力支配，瀕臨瓦解的主流權力再沒有任何說服力。然而，情況不是這樣。那股覺得「當下可以推翻一切」，從而敵視一切的革命狂熱，通常都是低估了客觀形勢的艱難險惡，脫離歷史現實。即使今日香港面臨主流秩序日漸瓦解的局面，但它的殘餘、碎片和餘溫仍然是舊世界抗拒轉變的一股強大的社會穩定力量。

我認為重溫文化研究裡，有一個觀念叫做霸權的觀念，有益於當下。文化研究裡，有一個觀念叫做霸權，它告訴我們，「統治」並非單純的壓迫，而是說進行得遠比想像複雜。「統治」，它所採取的方式，不只是簡單的鎮壓和威迫，而是利用一籃子為人接受的大道理和意識形態，來贏取大眾認同。

其次，在當下那股革命狂熱之中，似乎失去了政治上創造朋友的一面。常說，政治是敵友之分，因而，沒有敵對並不構成政治，但其實人們談得較少的是，若然政治上沒有朋友，也同樣成就不了政治。

從朋友一端思考政治，它便意味著友愛、互惠、聯合、團結和結盟。它的政治性格，體現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那就是，反對運動若要成功，它必定是建基於廣泛的社會連結和合作之上。反過來，胡亂樹敵，只會使自己陷於孤立。因而，政治必須為陌生人、朋友、盟友和意見不同者，努力創造出廣闊的政治合作空間，或至少贏取廣泛的支持和認同。

就是說，政治的困難之處，也許不在於四面樹敵，而是如何創造朋友，如何將社會不同力量拉到自己的一邊，建立足以跟統治當局匹敵的反對者聯盟。

5. 小結

零三年至今，十年來，這個城市的論爭和對抗有增無減，如果要濃縮成一句話，我會說，這是香港社會「反對意識」茁壯成長的十年。

筆者希望以自身經歷和觀察，嘗試疏理和分析。凡此種種，就是不想「反對」這個概念變得庸俗化，我想，沒有比台灣政治學者錢永祥說得更好的了，讓我引述他一段話作結：

「『反對』這個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反對」，既是社會的最後防線，也是進步希望，因而有了這篇反省。

《0371是大集匯》

回應人：張銳輝[4]　（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是一位教書的，主要是教通識。我先把陳景輝的文章作一個簡單的總結。我發現，他的文章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他把過去十年來的社會運動或大眾參與建立了一個分析的框架。當然，我覺得他這個分析的框架仍然有好大的空間給大家去討論，甚至可以和每個人自己的個人故事互相扣連起來。接著，我就想把近年我觀察到的、我身邊的學生在這一段時間中的變化來做一個對比與印證，或嘗試把這些觀察放進那些分析框架內思考。

他將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0371的前後。他給了這階段的標題為「眾人差異的年代」。他把那時期的社會運動與政黨、參選之類的社會動員及參與等等分野開來，而這些社會運動的差異是崇尚差異多元的。我頗喜歡他在其中的一個說法是，那時候這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或組織者都是追求一些另類邊緣的想法，但就並未有想取代主流的意圖。因此就衍生出一些如同志運動或不同的文化議題之類。當然，0371時的全民運動與動員固然是反廿三條，及源自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及躁動所帶來的大型動員。在我的角度而言，我會把0371看成是大集滙，內裏的想法其實與傳統參與的分別不是太大。為何這麼說？我接下來將會引用在我學生身上所見的，去嘗試引證。

然後陳景輝再提到第二階段，是強調本土與領導權的運動。例子是，我們由旁觀抗議示威，進而蛻變至親身參與的天星皇后的保育，以及喜帖街抗爭運動。他的想法是，這段期間就是那個蛻變期及過渡期。事實上，在那段時間，大家的本土意識似乎正在慢慢形成。在那段期間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無論是組織者抑或參與者，也不再追求一種我是次文化或另類的觀點，而是希望帶動更多的群眾參與，甚至步入主流。不過，他最後下了一個註腳，現在我們回顧過去天星皇后、甚至反高鐵的時候，那個主流秩序仍然比現在強大得多。

接下來到了第三階段。他嘗試提出，現在的這些反對運動或社會運動的發展都在急速成長。反高鐵可能是另一個轉折點，直至反國教運動，我們看見，這是一個沒有政黨甚至幾乎沒有傳統政治勢力參與的一場民間運動，而我們更看見，有種強大的迴響被帶起，發揮具體作用，甚至再延伸至最近的碼頭工人罷工。陳景輝會視之為社會反對運動的光榮點，但當然他也為其下了一個註腳，這些運動的陰暗面，可能就是那些所謂激進反對運動，譬如那些排他性的本土論述，或一些同路人危機意識等等論述。我猜，陳景輝是想為討論定出一個框架。而我則嘗試借用他的這套框架去思考我身邊的學生。

我發現，有一些很有趣的變化不斷地出現。2003年71香港剛經歷完沙士，我有好多學生因為一段時間停課而短暫沒聯絡，加上當時facebook這類社交媒體仍未出現，我和學生之間主要只透過e-mail交流或完成交功課等任務。直至七一前，校園內學生的關注並不是那麼多。我在學校教的科目是通識，而當時中六、中七的通識只是選修科而已。但我的學生當時因為也學過廿三條之類的議題，所以他們會問我七一會否去遊行。我們當老師的並沒有想過帶他們去遊行，所以直至七一後回校，大家傾談時提起，對學生也只有「願意行多步」的印象。到了天星皇后時，身處其中的朋友便留意到，開始有老師帶學生參加。但老師帶不帶學生去這些場合，其實與老師覺得與其教育工作是否相關有關。

當然，我也曾試過帶不算大規模的一班學生到過天星皇后現場。我的感覺是，我們作爲旁觀者的角色，去理解當時現場的情況，理解那一班人在做甚麼；而我們的學生，說得難聽一點，只是來現場參觀而已。參與感是不大的，學生只是知道有這樣一件事在發生，或最多只有如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做些如藝術創作的參與，學生普遍的參與始終不大。直至反高鐵，我們也是帶學生去現場，但是到現場後，大家都會覺得參與感強了，大概是因為附近有攤檔、攤位，可以吃吃喝喝，可以跟村民交流，甚至後來更有中學生參與當時的苦行。

---

[4] 張銳輝：中學通識科教師，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理事。

另外，當時因為有安排菜園村考察活動，我們一整個年級的同學親身到過菜園村，參與的投入感自然更大。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見到運動的開放性、包容性增強了。背後是否就正如陳景輝所說，是因爲當時的組織者或在其中的人士本身的意識強了。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我們的學生或老師會帶學生到現場，這些都是由於新高中開始，通識成了必修科目而出現的。在通識科裏，身份認同、生活素質或法治社會發展等等都是課程範圍的內容。於是我們有些基本的論述或分析就會傳達到學生那裏，或者老師自己本身已經準備了想法，在帶領學生參與的過程中，可以更名正言順地對外宣稱自己沒有意圖，只是帶學生實地考察、進行課程活動而已。這些都造就了更容易參與的基礎。

更有趣的是，到了反國教，我們無須再帶學生去這些社會運動的場合。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因為適逢放暑假，造成老師與學生的聯絡上出現問題。其二是反國教本身就是由學民思潮——一個中學生組織動員起來的。中學生成為一個重要的動員組織。因此從學生的角度看就是：「我們還需要老師帶嗎？我們去參與其實就是去和一些跟我們一樣的人一起」。這些都是一些好有趣的變化，間接引證了陳景輝後來的一些論述。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警惕雅閣賓式的狂熱》

回應人：陳景輝　（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記得是在十年、八年還是七年前，在利東街洗樓，因為要游說街坊出來反對市建局，要游說其他街坊贊同我們的方案。通常就有街坊提出，「你看七一！七一不就是成功推倒了廿三條嗎？真的是可以呢！相信人民的力量啦！」。當然當時我們沒有想過如何動員五十萬人出來啦，那只是一些小團體的定調，而翌日報紙又有另一定調。這件事讓我不禁聯想起六四。六四屠殺後都有一個現實的定調，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這就好像一旦有一個焦慮，北京就會定一個調，把人心都吸過去了。正如六月四日之前，大家都覺得學生是很酷的，好像吾爾開希一樣。但六月五日就出現一些論調，覺得是他們太任性了。回到我的文章，其實是來自一種焦慮。

先說一點文章以外的東西。以前總會覺得，好多人政治冷感，不會參與政治運動。但現在相反，現在是即使有政治熱情的人都不會隨便表態或參與一些反對運動。因為即使用錯一句口號或詞語，又或是用對也好，都會受到千夫所指，萬箭穿心。所以，我其實是由零一、零二年已經開始參與一些小規模的直接行動或社會運動。至零三年不知為何，又去參選區議會選舉。我有好長時間在參與反對運動，這背後的焦慮來源是什麼呢？是我最近兩年開始覺得以往的經驗不再適用了。從利東街、天星皇后，到反高鐵，我們原來的思想資源、對待盟友的態度、反對視野都好像很容易遭到同路人的扭曲，而所謂同路人，往往是一群自命激進的民主派系。這份焦慮是很深刻的。於是乎，我最想做的事是想檢視當下，我命名為，敵對失控的狀態。

張銳輝嘗試用他這十年的教學經驗，如學生都有出現在現場，去印證參與感的濃烈，由被動轉變成主動，由旁觀變主動，由弱變強。我想再進一步去想這一班人，除了是由旁觀變主動、由被動轉變成主動，感覺由弱變強之外，他們是帶著一套如何不同的反對觀念。他們背後除了具體的政治議題、社會議題外，其實信的是甚麼政治信念呢？

當然我沒有馬老闆的或生哥的文章，翻查了好多歷史資料。我的參考都是來自我的個人經驗。近年的變化，我會把它命名為雅閣賓式的狂熱。雖然沒有斷頭枱，但象徵式的斷頭枱卻有很多。當中蘊含很大的轉折，是關於人民的想像。根據我的分類，最初03年前後的香港社會運動，往往帶著一股頌揚多元和差異的氣息。基本上都是以差異的角度思考問題，大多是主張社會需要多元化一點。於是當時我總不斷思考著，要把「人民」的觀念解拆成眾數，其內裏應該有好多不同的「人民」。至零六零七反天星皇后時，「人民」的觀念開始轉化。我們開始想提出本土。不再如以前般純粹追求另類、多元關係等等。直至提出本土，大家開始不再提差異和多元，卻開始著重社區、地方，例如以街坊，小販等等去定義自己，抗衡李嘉誠的資本壟斷。

近年，有趣的是出現一些變化，那是我所關心的當下，我形容為是一種雅閣賓式的革命狂熱。人民不是基於差異，因為差異可能會被理解成賣港賊（像是政治策略上的分歧），但也不基於一種地方歷史與內容，亦不是像反高鐵時擺出聯合各方力量的姿態，如請民主黨食乳鴿（作為對該黨的白鴿徽號的嘲諷）。不過，基本態度為大家仍然是盟友，並不會一下踩死他們，而是希望他們改良變化。或者乾脆去策劃一種聯盟，這是對葛蘭西的一種最基本的套用，即是去吸納溫和力量，而不是通過踩死溫和力量以建立自己的革命派別。

近年，我開始重新閱讀《思考法國大革命》那本書，我留意到那一種象徵性的人民，是通過一系列二元對立構成的：溫和、激進、維穩或革命派。但是這種人民又不是真的，只是純粹價值的變態物。那是什麼意思呢？舉個例子，正如我們現在正爭論政改，「2016年普選，立法會都醞釀許久了，為何現在的人都不再重提？那不就是一種出賣嗎？」　這就是人民的力量了。這類人民的意義似乎在於，革命去到高地，便體現了人民。其他不同的聲音，就全

變成壞的以及阻礙實踐的。這種人民象徵性的鬥爭，造成我們不斷去爭論誰最有代表性代表人民，誰才是真正在為人民說話，這些就成為最當時得令的反對意識。

這些反對意識我覺得並不代表人人都是這樣看事物，但不知是否如槓桿原理。舉一個例子，最近有一個叫陳雲的人物，其實他的facebook status平均只有三百幾人like而已，但是前陣子他去批評支聯會「愛國愛民」口號時，卻被蘋果日報刊載成要聞，並成為本土派。我覺得，現在的人民就好像是面臨一種六神無主的狀態，正像葛蘭西所說，老的垂死新的未活的狀態，並衍生出奇怪的東西。

我以一句說話作結。我所以關心這個方向，是因為我覺得這並不是朝向好的社會方向發展。最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相片，那是九六年六四燭晚會的一件T恤，同樣來自支聯會，T恤印著：「愛國愛民，香港精神，跨越九七」。雖然我不同意這句口號，但當時並沒有現今的罵戰。當下要檢視的就是反對意識的問題，亦通過自己過往經驗的比較，作為一種補充。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綜合討論：

《以中時段思考七一》

評論：小西[5]　（標題為編輯所加）

今次要讀的這篇馬國明先生的文章，與我以往所讀過的他的文章一樣，都是十分強調從歷史的角度去描述一些現實裏面發生了的事件。0371至今已有十年，若以傳統歷史學來說，那只是當代，仍未成為歷史的一部份。但馬生提出了一個角度，就是七一雖然未進入歷史，但我們是可以以一個歷史的目光，拉闊來看這件事，並由此為這件事重新定位。

當然，不同人在不同位置，對七一的理解都各有不同。例如我看陳景輝的文章，他主要以一個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角度——正如他自己所強調，他的社運參與是由2000年開始的——去檢視一些他覺得重要的事件。但這種做法掠過了其他他覺得不是最重要的事件。所以，看完了這兩篇文章，引發我思考的其中一件事是，沒有一個單一的七一故事。

七一，我們好多人都會把它純粹理解為七一遊行，還是除了遊行以外的故事是否都要收納在其中？我覺得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為七一提供不同的碎片以豐富這一個故事。但是講故事以前，我們十分需要一個context來作故事背景基礎。本次工作坊的文章裏，提供了許多這些故事不同的context，譬如陳景輝會講本土，羅永生會用公民社會及後殖民的角度去講。故事之間未必互相矛盾的，可能是可以相輔相承，及可以拼合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拼圖出來。也可以好像許寶強的主張，以階級、全球化等角度去討論這些問題。當然除了不同的角度以外，我們也是可以以不同的歷史角度，以不同時間線的角度去思考。

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每當我們提到七一，必然就是指向0371，但71又是否03年才開始有？我最深的印象是，類似七一的遊行，其實自1996、1997已經開始有。當時未必叫71，有些是在6月30日的。而至1997及1998年，每年的71都有遊行。但以數量計，當然沒有03年般盛大。假如我們一直把時間往前推，以一個拉闊的角度，長時段或中時段來思考，其實是什麼可能性在0371爆發以前已經出現了？有些可能我們有繼承，有些我們可能已經放棄了。如果我們對十年的七一作出回顧，十年來我們是否有些部份已經成為了困局？我們又是否可以通過對歷史的檢拾，從而拾回一些0371以前失落了的東西呢？我覺得這做法是能夠在不論是空間還是時間角度，都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檢拾我們對「七一是什麼」的一些疑問。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5] 小西：原名鄭威鵬，文化評論人，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曾為香港獨立媒體創會成員，現為全人藝動、四圍講古及正念文化發起人之一。（網站：http://angelland3.wordpress.com）

《給被壓迫者充權的人民歷史書寫》

評論：蒙兆達　（標題為編輯所加）

看過了馬老闆及陳景輝的文章，我也有一些回應作補充。馬國明提到，香港市民再一次創造歷史，不過他的論調比較失望，因為這個歷史被扭曲了，並受到當權者的收編。特別在文章較後部份提到一個說法，就是將七一的參加者講成是，市民因為對經濟問題好不滿，民生問題好不滿，因此才上街而已。這些都是跟政治或民主無關，亦與廿三條未必有直接關係。這一種說法我自己當然會認同當權者的論述是一種相當無賴的論述，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會有點戚戚然，因為是否完全與經濟民生無關？當年七一大遊行的社會根源是怎樣？如果我們把七一大遊行放回社會脈絡去，站在我的立場，會有不同的詮釋。如果我們只是把七一理解為純粹對人權民主的追求，而與現實中市民正面對的困境無關的話，這裏可能根本就存在著一個空洞化的問題。當回到社會根源又是怎樣？我經常將這個問題從九七年回歸之後的九八年金融危機，來觀看香港整個社會境況的轉變。

事實上，我是覺得九七年回歸之後，九八年金融危機令社會整體資源結構分配或基層市民的待遇狀況帶來一個好大的轉變。而當時發生的狀況，正正是今日我們目睹在希臘、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出現的所謂緊縮政策。如果我們把目光回到九八年之後，當中連續有五年時間，政府是陷入財政赤字之中。政府回應財政赤字的方法是不斷推出緊縮政策，包括先後兩次削減綜援，及在公務員系統內引入合約制及將之外判，以及加速私營化，也包括停建公營房屋等等。這些問題的而且確在社會上製造了相當大的怨氣和不滿，而這些不滿在七一遊行爆發出來的時候，便完全指向了董建華的無能及政府的管治問題。這些「危機」的轉化，大家可以理解為當經濟危機出現時，政府所面對的困難是它需要作出取捨，它要在繼續滿足市民需要的情況下，是選擇分配資源去滿足市民？還是選擇分配資源去解決資本的危機？或是嘗試舒緩資本累積所面對的問題？當時政府的做法跟好多提出緊縮政策的歐洲國家一樣，都是選擇了偏向資本的利益，透過資源上的重組，再一次向資本傾斜。

所以我們見到，每一次經濟危機出現時，大家的意識形態都是要共渡時艱，而不去了解為何社會會出現問題。但每一次危機之後，每一次的經濟復甦，卻令貧富懸殊不斷地惡化，資本和富有階層手上所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我們去探索七一大遊行的社會根源和背景時，我們就會重現一種階級的視角。當我們把七一大遊行放回具體的社會脈絡上時，亦令我們的批判指向壓迫的社會關係及資本的邏輯。

當然，當我看馬國明的文章時，我經常會追問自己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不滿於當權者的歷史書寫時，到底屬於人民的書寫又會是怎樣的書寫？當然我們斷不會理解所謂的人民書寫，就是等同於非當權者及非政府的書寫；那到底一種人民視角的書寫又會呈現出怎樣的狀況？這個層面上的回應，其實與陳景輝文章上所提到的領導權其實是相關的。陳景輝提到的領導權正正是葛蘭西的分析內的統治者，不單利用武力及軍事來統治國家，也是在利用民間社會內的意識形態來統治國家，是獲得被統治者同意下的統治。所以這不純是一種強制，而是一種被統治者的同意。但是這一種領導權的說法也是有一種傾向，是把領導權看成是統治者的工具，只是這種工具是獲得同意，而非通過強制而來。但是我們只要從社會運動或階級的角度觀察時，領導權也是一個戰場，一個領導者與被統治者爭奪的戰場。

所以，餘下來的問題是，社會運動和人民運動都需要回答，當我們和統治者抗爭的時候，如果領導權是一個戰場，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怎樣形式的領導權，能令反對運動可以不斷壯大，並由此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以及新的價值？當然，當我們回顧七一大遊行以後十年的變化，其實在某程度上我們都能見到以往主流的意識形態，那種所謂的自由市場萬能，多勞多得的獅子山下精神，或憑個人努力可以出頭等，這些意識形態在金融風暴以後，經過不斷的企業重組又剝削，不斷導致貧富兩極化的政府政策下，已經是越來越少人相信，這一些意識形態是正在逐步瓦解。時間留下了一個空白，在今天我們見到的是右傾本土主義抬頭，某程度上也是在搶奪新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但是在左傾或較注重社會進步主張的觀點上，又如何

在領導權上可以建立另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而有助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這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回應的另一個問題。

但是我從近年民間運動的變化中，見到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以往當經濟危機出現時，往往我們的反抗都是一種本能式的反抗，就是我們要去維護既有的利益和資源不被侵奪。我們要去抵抗當權者的剝削，及對我們的侵犯。但是我們現在能見到的，不論是反高鐵運動還是一些本土保育的運動，或者是紮鐵工潮碼頭工潮等等不同的工人抗爭，我們的反抗開始不再是defensive的一種反抗，而是我們要爭奪，去改善收入、我們要重奪城市的生活空間。在這些運動中我們可以見到一種對社會未來的構想和想像出來，我們也在這些實踐這些構想中，帶出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及願景。但是這種希望和願景都是模糊而不扎實，這也是剛才所提到當主流意識正逐漸瓦解之際，這些新的較進步的意識形態卻仍未是十分扎實。

回歸剛才我所提到的人民書寫與當權者書寫，從這些我觀察到，當權者的歷史書寫最大的分別在於，這種書寫具有將被統治者去權的傾向，而人民的歷史書寫則有人民充權的傾向。這也提醒了我們自己，從事社會運動抗爭時，我們好容易傾向形容自己為被害的客體。這一種觀點是來自我引用了多年前趙剛的文章，就是「妒恨的政治」。我們好容易傾向理解自己為一種被侵害、被剝削的狀態，但卻不能在運動中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所以在許多時候當有人為人民作書寫的時候，在書寫的過程中，表現出他們對被描寫對象——被壓迫被剝削狀況——的同情，但是這種同情的狀況往往把他們描述為無能力反抗的被害客體，這種做法某程度上都是代入了當權者的歷史書寫之中。所以一種新的書寫，人民的歷史書寫將是一種可以令被壓迫者充權的一種書寫。

當然，我提到人民的歷史書寫時，並非指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書寫，也包括一般寫作或新聞報導，因為在很寬鬆的角度看充權的解釋都是歷史書寫。以當權者角度寫出來的故事或報導，就看不見人民在其中的角色，又或者嚴格一點，社會運動、人民運動在歷史裡發揮的作用是什麼。正如僱傭條例的出現可能是因為施政者留意到勞工問題出現，所以立法舒緩社會現狀，而不會指出立法背後原因為六七暴動影響政府的管治危機。又如書本著眼公屋計劃為麥理浩的德政，而看不見人民在其中給予的壓力。若果看日後如何描述最低工資立法，相信也不會提及職工盟組織了多次遊行，又或者是過去十年五一群眾高舉最低工資的旗幟，反而會被說成曾蔭權任內一項回應社會需要的政策。所有這樣的書寫過程都會變成人民無法參與其中亦看不到其作用，而是施政者基於客觀的社會經濟形勢變化作出的政策。一個以這種視角寫出來的故事，我會理解為去權的書寫，是一個代入當權者思維的書寫。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開首中提到「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我想當中意義是，在審視歷史時不止單純看見資本家如何不斷剝削工人，而是馬克思的視野中，在社會的演變裡階級抗爭所發揮的推動作用，因此，歷史從來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歷史，而是資本與工人鬥爭的歷史。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反中產霸權》

評論：蘇耀昌[6]　（標題為編輯所加）

陳景輝剛才提了一點好有趣。他在文中提出他的困惑，在他筆下，文章首兩段（首段以2000年開始，是「頌揚差異」的年代。次段以2006及2007的城市保衛戰開始，是「強調本土身份」的年代)），在陳的陳述下，儼然香港社會運動的光輝歲月，充滿輕快的力量。之後轉入了第三個階段（即「近年」，是一個「立刻推翻的時代，或敵意失控的革命狂熱」，「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的年代）。在此階段，作者充滿疑問與「不解」。

我覺得這個「不解」很好，　因為它可帶來反省。可惜沒見到陳景輝處理這個「不解」。他未能對為何發生這些事追問下去。不過他提出了問題：「為何社會運動出現雅各賓主義、人民互相攻擊？為何大家不再重視盟友？為何變得不理性。」陳景輝提出「問題」，但沒有回答：為何社會運動在前兩個階段還是可以，第三階段就不行？發生了什麼事？如果陳景輝答不了這些問題，我想他的困惑是無法解開的。

回到馬國明老師的觀點，零三七一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馬老師將零三七一與八九六四比較。我同意，因八九六四在港人心中是就回應九七回歸。大家都很害怕，那是重要的連接點。而零三七一是回歸後，由種種經濟危機與民怨爆發而成。其根源可回溯至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說起。從這一點開始，港英政府開始在香港推動一項政治藍圖。這個政治藍圖是甚麼？很值得討論，但討論會沒有許多文章討論到這問題。更重要是，階級分析不見了。我十分同意蒙兆達的論點，他問：階級分析去了那裏？

我試從這裏出發。由八五年開始的區議會選舉，至後來九一年的立法會選舉，如說文化政治，文化身份，文化霸權上，有些什麼正在形成，那就是「香港人」。「香港人」以什麼作為論述的標準呢？就是「中產階級」。由八五年開始，一種以中產階級來建構香港人身份的工程開始浮起。零三七一就是中產階級經歷經濟危機後走出來的反抗，但出來的當然不全然是中產階級，亦包括基層。我和蒙兆達曾經在零四年元旦遊行時，聯合過基層組織在遊行中舉起「基層有話要說」的大旗，以顯示基層從沒有缺場。傳媒及一些學者說「遊行的人是中產階級」，這都不是事實，因為我們是在場的，很多基層民眾都有參加。我們一直努力爭取話語權與反中產霸權，就是不接受「香港人」身份是用中產階級來做內容。可是，直至目前，許多人說香港價值時，依然以中產階級價值為代表。

在零三七一的時候，我們見到，中產階級在過去二十年形成後，因為經濟危機而進入困局，出現反彈，走出來。過去中產階級被塑造成樂觀、包容。但那種冒升的運動力量已經崩潰，部分中產已變得反動。零三七一反映的是霸權瓦解、有關中產階級等同香港人身份的瓦解。零三七一之後，衍生出不同的本土身份。

曾有「八十後」朋友在公開場合說過，香港民主派斷送了香港過往三十年機遇。在我看來，這類觀點，就是陳景輝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正是這種在零三七一後呈現的激進否定，結果有份令今日的民主運動寸步難進。用陳景輝的話，就是不理性、不重結盟。陳景輝提出連串問題，應放在歷史脈絡裏看。最後一句，我想說的是：就是不應忘卻階級分析。否則，我們不會知道，「香港人」是甚麼。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

[6] 蘇耀昌：加入過基層權益互助社、基層大學、街工等團體；出版過民間抗爭、基進論壇、街角等刊物。三十年屢敗屢戰，現職街工。

《公民社會與虛擬自由主義的解體：兼論公民共和的後殖主體性》

文/羅永生[7]

十年之前的七一，香港爆發了重大的抗爭運動。超過五十萬人在烈日下走上街頭抗議，導致民望低企的特首董建華下台，23條立法擱置。十年之後的今日，特首梁振英的民望也在谷底徘徊，社會上也存在極為躁動不安的氣氛，香港仿佛再次面臨一個鉅變的前夕。回顧零三七一以來的十年，為的是以七一為起點，追尋及反思香港重臨困境的原因，再而籌謀可行的未來路徑。本文嘗試在公共論述中找尋關於七一的不同論述模式，並反思這些論述如何返過頭來介入建構香港這十年來的公民實踐。藉著一些反思性的觀察，本文第二部會伸論香港虛擬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的困境與危機。在最後一部份，則借公民共和主義的政治哲學，試圖提出建構後殖民香港公民主體性的一些問題，俾作進一步的論辯。

(一) 雜異紛陳的七一論述

七一大遊行爆發的前前後後，媒體對七一有很多熱烈的討論，這些言談論述，未必有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但大體上還可以分辨出幾種不同論述，不停的在相互爭持之中。其中最主導的，應該是配合「泛民」主導分析架構的「中產覺醒」論述。例如，在零三七一之後不多久，民主黨的陳和順就以七一是中產走上本土政治的舞台的角度來詮釋，他說：

「不少人已經提出，七一遊行是一場五十萬港人集體參與的政治洗禮。它徹底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因為香港中產者開始走上本土政治的舞台。那麽，中產者的政治要求是什麽呢？未來香港本土政治的發展，應朝哪一個方向，才能回應他們的政治要求呢？」

在文章當中，作者描述香港中產不是一些追求狹隘階級利益，而是代表希望和理想。他說：

「中產者所爭取的，主要不是什麽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是一套理想的社會制度。中產者所堅持的，不是個人利益的主張，而是香港的主張，也就是香港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社會的主張。中產所代表的，是一個希望，一個夢，一個中產夢。但是，這個中產夢，並不專為中產者而提供，而是開放給所有階層的港人參與的。它指的是，只要社會存在真正的平等機會，所有人都可以憑自己的努力爬上社會階梯，最終出人頭地。」

「歸納香港中產者的政治要求，中產政治所代表的，主要不是利益政治或權力政治，而是價值和理念的政治。香港沒有中產黨，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在很多中產者的心目中，中產政治首先不是利益政治。香港中產者主要並不代表什麽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對於利益政治，他們並不抗拒，卻也並不特別熱衷，因為很多中產者都不相信，面對香港當前由政治和經濟轉型而帶來的重大危機，和極為複雜的結構性問題（例如中港關係問題和財赤問題），傳統的由壓力團體和政黨所代表的利益政治，能為香港帶來出路。」《香港中產者的政治要求是什麽？》陳和順 信報2003.8.27

和「中產的七一」論述分庭抗禮的是「群眾運動」論，這種論述強調的是七一的自發性和多元性，並不具有完整的政策或價值訴求。這些論述將七一描繪為全新的民間政治現象，因為七一大遊行並沒有組織去推動，不同的參加者有不同的訴求。七一不能被統攝、被歸納，它是一個危機狀態下的偶然產物。 例如，信報在一篇評論中說：

---

[7] 羅永生：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殖民文化史、香港電影、政治與社會運動、宗教社會學、文化理論等。著有《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殖民無間道》、編著《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合編《宗教右派》，學術論文散見《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postions: east asia culture critique》等。

「七一大遊行這種近乎「快閃」式的群眾活動，是現代社會的新產物，是值得政治學者、社會學者、傳播學者深入研究的新現象，它並不需要任何組織者串連、聯繫、鼓動、組織、策劃，一切訊息都在大眾媒體上傳播，而這些訊息非常簡單，只需說明日期、時間、地點，群眾自然會按時定點聚集，所謂組織者根本沒有特別工作要做。試想，如果真有一個組織能夠統一五十萬人叫喊的口號，它的力量足以推翻特區政府，與中央討價還價。」《何需介懷口號了解遊行本質》信報2004.7.3

「群眾」是這類評論的分析單位，「群眾」並無持續明確的訴求，只是一種短暫的產物。這種多元化新型社會運動的論述有時是沒有政治目的的純粹社會觀察，但有時這種強調七一參與者其實是非常雜異、多元的論述，在有意和無意之間，就跟親官方的論述合拍，以七一其實沒有統一的訴求來為官府打發掉七一事件帶來的政治壓力。

有趣的是，和這套鬆散無組織的「群眾的七一」相並立的，是另一套視七一為「成熟公民社會」自身表現的論述。例如，鼓吹溫和妥協路線的陳健民就曾在一篇評論中談到公民社會正思考如何「保育民氣，持續七一精神」。他又寫道：

「妥協既為政治的藝術，溫和民主派不得不在中央與選民的狹縫中尋求平衡。相反，公民社會在民運路上仍然空間廣闊。由民間組織構成的公民社會，以維護社會的價值和利益、監督政府為務。公民社會不單是民運動力的來源，亦是鞏固民主制度、提高民主質素的社會基礎。在上下互動的民主化過程中，公民社會要凝聚民間力量，不斷向政府施壓，直至政府明白不進行改革將付出更高成本。未來特區能否再度發揮人民力量，在於政府的管治質素和市民的民主意識。民間組織必須緊密監督政府，經常向公眾講解哪些施政失誤源於政治體制的錯置，此中亦要有相應的研究配合。在傳媒、學校及其他社會團體，民運組織亦要有系統地推動民主教育。」《民運溫和派建制改革派結盟　論香港民主運動出路》陳健民　　明報2004.10.18

在陳健民筆下，公民社會的政治態度是清晰的，單向的，任務都是向政府施壓。這種公民社會的想像，簡單來說就是將公民社會都看成是反對派泛民政黨的民間分支。不過，對於公民社會是否空間廣闊似乎不那麼樂觀的曾澍基，就抱怨公民社會並未能成功的促進理性溝通。他說：

「香港近幾年的社會與政治紛亂狀態，源自殖民地的歷史包袱、過渡期症候群，以及在1997年之前設計出來卻大有漏洞、半生未熟的「次民主」制度。經歷董建華低效率和備受打擊的管治後，情況更趨嚴重。在以往的文章，我總結了本地兩個最嚴重及根深柢固的問題：一、由「死硬反共」到「機會主義式愛國」的紛雜意識形態；二、建制內外政治精英的發育不全。須促進崇尚理性溝通的公民社會要克服問題，我們應該發展廣義的社會民主，即促進崇尚理性溝通的公民社會，平和地處理分歧。它有助培育較成熟的政治文化，特區若出現多元而避離極端的權力中心，北京神經過敏的機會將會降低。這對香港可能是一個次優、非激進，但較持久的解決方案。」明報《由紛雜到多元？香港政治的兩個推測》曾澍基　明報2004.10.29

雖然曾澍基抱怨香港的公民社會仍未培育出「成熟的政治文化」，並視七一為一種政治紛亂狀態，但社會上也存在著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態度，視七一為一個成熟的公民文化的見證。例如，署名鄭建生的一位評論作者寫道：

「筆者幻想，七一遊行可以超越所有利益爭逐，超越主辦單位的政治議程，可以容納所有香港人，即使意見相左；容納所有訴求，即使互相衝突。若是如此，七一遊行便成為一個世上罕見的公共空間。世人若看到一群人喊著「還政於民」，另一群人力竭聲嘶作出反對，但雙方都接受對方的發言權，那便是政治也可不醜陋的民主樂土。……　民主嘉年華各適其適，公共空間自由表達，相互接受。香港七一已經吸引內地及海外旅客來港親身一看。香港文明若再向前走一步，七一遊行甚至可以發展為「民主朝聖之旅」。」《七一嘉年華、朝聖及公共空間》鄭建生　信報2004.7.8

這篇文章的作者充滿熱情地歌頌香港多元政治的「文明」，自我陶醉於視年復一年的七一為香港特有的一種文化奇觀，認為七一可以招來各地人民，前來參加香港的民主朝聖之旅。這位作者的論述雖然語帶狂想和嬉戲，但吊詭的是，它卻很能說明七一後長期成為傳媒主調的「七一嘉年華」論述的藍本。在這種論述底下，「嘉年華會」的想像就等同了「公共空間」，「意見相左」卻又能「各適其適」的「自說自話」狀態，就等同了「自由表達」。這種「七一嘉年華論」和上述的「快閃群眾運動」論互相輝映，互相註釋，共同將七一構築成一種令人振奮的奇觀(spectacle)，透過它香港人以為那裡就是公共空間，也就是公民社會，也就是充滿怨氣的民眾，也就是人民力量， …..。

「七一大遊行」作為一個回歸後香港政治文化的一個核心的符徵(icon)，吊詭地卻也同時以這種浪漫的集體嘉年華想像，顯示了「公民社會」日益只是香港政治文化的浮動能指鏈的其中一環，與「公共空間」、「自由表達」等一樣，失去了它們的具體所指。當它們重重複複的被徵引，在公共領域流通的時候，都只能構作一種「反對派政治」的「擬仿物」(simulacrum)，從而延伸著香港特有的那種「虛擬自由主義」。

遠在九十年代，曾經有一份刊物《民間抗爭》，積極地詮釋「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等概念的實踐意義。可是，這種比較認真的社會反思，在當年「九七大限」主導一切公共論述的時候，無以為繼。回歸之後，七一大遊行被
視為香港再政治化的起點，或公民社會展現其積極活躍性的徵兆。但筆者認為， 以街頭大示威為焦點的「七一想像」，實質上只是延伸著一種未能使公民培力充權的「虛擬自由主義」。它更遮閉著香港人對零三後香港社會自我認識的無知，理論上及分析上的癱瘓與無能。因此之故，很多政治活躍分子也完全無法預見近來民粹主義洶湧澎湃、族群主義熱浪爆升、公民社會急劇的劣質化和政權建制力量全面滲入、吸納及掌控公民社會的趨勢。

筆者進一步認為，七一十年以來，政治反對運動衰頹無力，引致論述真空，思想貧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七一大遊行這類浪漫化而又沒有內容的想像參照，把街頭政治、嘉年華會政治等想像，取代了對公民社會內部動態和權力關係變遷的應有關注。因為，「七一」樹立了一個浪漫而空洞的公民社會想像，將公民社會想像成純然自發，毋須刻意推動、組織。公民社會永遠被想像為站在進步價值的一邊，卻忽視了公民社會整體日益被分化、瓦解、籠絡、滲透、吸納的趨勢，亦即是完全無視了公民社會的陰暗面(dark side of civil society)。而政黨亦自視為與公民社會發展無涉，既無對應公民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針，也日益沉迷在選票和議席遊戲，完全和公民社會疏離脫節，陷於被動和使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真空的狀態。

在這種變了色的公民社會想像底下，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看待為一個「戰場」，社運者亦不能透過諸如葛蘭西的(Gramscian)視野，區分出「陣地之戰」和「運動之戰」。而在關於七一街頭大遊行的神聖浪漫想像底下，社會運動變成街頭示威的展演性(performative)、表達性(expressive)的行動。除此之外，社會和政治運動仿佛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開展。只是到了反天皇、皇后碼頭清拆及利東街遷拆等新城市運動的興起，這些象徵性抗爭行動，方開始與運動產生比較有機的連結。這些新型運動改變了各自孤立的單議題社運，並將諮詢架構、城規程序等都納入社運活躍分子可以去開展抗爭的範圍去。

事實上，七一大遊行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都並沒有嚴肅地接受「公民政治」發展的批判。其中一個被含糊其辭地躲閃過去的是它的所謂「多元性」。七一大遊行並非真正的政治多元主義現象，因為作為眾口一聲的群眾動員，七一仍然是官民二元對立動力下的產物。在參與遊行隊伍中的多元議題非政府組織之間，並沒有交疊和衝突的地方。 七一片面強調多元性的結果，反而是令人將多元性理解成互不理睬的「寬容」，掩蓋矛盾的「寬容」。而只會凝視遠觀多元色彩的抽離視角，也只是在幻想一個公共空間。以七一作為宣傳場合和籌款機會，更加只是用多元並陳的表面共存方式，來掩蓋潛在於公民社會內部的價值和策略衝突。

七一嘉年華的異色奇觀，正好陷入了虛擬自由主義政治的巢臼，在歌頌這種公共奇觀的同時，遮抹了對公共性性質的爭議，無視各種公共性聲稱內含的張力，忽略形成公共性條件的

權力爭持。事實上，七一十年來的一個大失敗，就是在七一當日的遊行活動之外，也就是在每次的籌備、組織過程中，根本不能搭建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可以進行有效的政治爭辯。這就使七一加劇地儀式化和節慶化，七一雖然在零三年曾經凝聚大量民眾，但過往十年來七一的組織操作，都只是以傳統非政府組織為基礎的事務連結。於此之外，卻不能成為真正能凝聚香港公民社會力量的平台，一個成熟香港政治社會，亦無法因之而誕生。

(二)殖民主義與虛擬自由主義

上面這些問題，可以溯源至在九七之後香港的特殊「後殖民處境」一個總體的問題，也就是香港人仍未脫離以晚殖民時期中英雙方所共同搭建的「虛擬自由主義」框架去思考、理解和想像香港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以及這個共同體作為一個集體的主體性。在這一部份，筆者將先簡單回溯香港在英國殖民結束前後香港身份和主體性的政治，論述為甚麼「虛擬自由主義」是獨特的香港殖民性過渡所產生出來的政治文化。

眾所周知，戰後英國在香港並無長遠管治政策，亦不介入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問題。但自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為了收拾1967年暴動後的亂局，及預備將來撤出香港，港英政府開始積極建立香港人的歸屬感和香港認同。乘著七十年代開始的經濟增長，港英致力於打造香港　人的新自由主義式主體，成為英殖晚期所維持的殖民狀態(coloniality)。這種晚殖民時期的殖民狀態需要為「香港人」建立一種香港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建基於對香港經濟成就，經濟模式的認許，並從而建立一種香港人的優越感。而在80及90年代，由於英人撤出在即，這種香港自豪感更由經濟成就再而引伸到「英人治港」期間所建立的　法治與基本自由。而在彭定康的年代，更宣稱香港活躍的公民社會也是英治的功績。

可是，這種關於香港共同體的美好描述，並非來自這個社群對自身經驗的歷史反思和總結，而是晚殖時期本土中產新一代對香港投射的一種共同體想像。在打造這種晚殖迎向後殖的社會想像中，中產知識分子將自身也同時想像為香港社會的主導階層。將自身的利益看成是全香港的利益。在相當程度上，這種想像是香港經濟奇蹟得利者的經驗總結，也是一個新自由主義主體的變奏，一個建基於「最小國家」(minimal state)想像的香港社群想像。

這種想像事實上不是從外強加給香港，反是被八十年代上台的新保守主義者戴卓爾夫人，挪用到英國去推動而英國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她對個人與社會共同體關係的名言是「只有個別的男男女女，只有家庭，但並沒有社會這回事。」戴卓爾主義的這套思想，奠定了新自由主義下「經濟人」主體性的基本形象，與香港社會學家劉兆佳關於香港人「功利家庭主義」的說法若合符節，共同認為並沒有天然地超越於自利個人的，更大的政治及社會生活單位。社會及國家都是自利動機為出發點的個人，在功利考量下的「工具性」結合。

這套共同體的想像是建基於新自由主義主體，配合了香港高度流動的城市特質，但也騰空和延擱了香港的文化傳統、民族歸屬和國家認同問題，將香港這個共同體的自我想像高度地管理主義化。這套以管理主義為基柢的社群想像，也迎合了香港在急速經濟發展過程，分享了向上流動利益的中產精英。這批以戰後嬰兒一代為骨幹的中產階級，也是中英協力安排主權過渡，承諾以「港人治港」來建立後殖民特區的最大利益分享者。他們一方面站在專業、科管階層的利益出發，努力以中產者作為香港中堅的角度，盡量擴大科管階層的利益，維持專業支配地位，並以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充當整體香港的主流價值觀和世界觀。然而，他們也非常害怕社會轉型的大格局，會動搖到自身分享因新舊殖民交接而創造出來的新機會。於是，他們只能從管治主義的科管階層價值觀引伸出一套半調子的，謹小慎微的自由主義政治想像，並按此而發展一套實踐方式和潛規則，形成一種政治文化，筆者名之為「虛擬自由主義」。

「虛擬自由主義」並不意謂是一套實行者並不相信的「虛偽」，而是「半假當真」，劃餅充饑式的自由主義實踐。它意指那套明知遊戲是假，但仍當作為真的一種循規蹈矩精神，也包含對遊戲的虛幻性質，周期地施行象徵性和儀式性破壞的習慣。港式自由主義實踐，不斷仿

擬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終日與海市蜃樓的，作為一種「擬象物」的「半／假自由／民主體制」打交道。但是，這種高度儀式性、象徵性和仿擬性的實踐，也成為「半假當真」的政治劇場上被展演、被消費的符碼，難逃自身也成為「擬象物」的一部份。因此，「虛擬自由主義」也並非赤裸裸的專制主義，而是把對它的反抗也事先包容吸納在內，終日不會停止演出的狂想戲劇。

「虛擬自由主義」在充滿表演性的九七過渡期奠立。在不斷針鋒相對的外交表演下，香港人亦被不斷的編進反對派的戲劇對抗，並在不斷的展演當中，形塑了自身的某種「港人身份」。使虛擬自由主義也成為晚殖時期香港人主體形構當中一個主要構成部分。今日透過反思和回顧，當知這種「香港身份」其實是建基於那套工具主義化、新自由主義化的社群想像。於是，雖然「香港身份」具有某種反對性和異議性，但畢竟是主權過渡下利益分沾者的自我想像，所以並沒有強烈的主體意識，要求實現自主、自決，因為歸根到柢這是過渡期內，「無奈」(但也又欣然)地接受中英在港人缺席的情況下，默許前途由他人決定的「港人身份」，但這是一種欠缺和迴避了主體性和主體性問題的「身份」。

在「虛擬自由主義」的構造當中，古典政治自由主義的價值，例如對人權、法治、民主等的執著，捻連著一種自利為尚、工具為先的新自由主義主體觀。但正因為後者，使得君臨的國族政權可以無痛地與香港中產階層達成一種有張力的妥協，因為吸納中產專業力量並不會和完整地接收這塊舊殖民地的計劃相左，反而會增進其發展一套成熟的管治技術。

在這情況下，新宗主政權和本地的中產者處於一種既聯合又鬥爭的狀態。一方面，新的宗主政權要維護殖民地既有的權力和利益安排，照顧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協力維護平穩局面，以讓新的宗主政權權力和平接收，另一方面又不安於英人在這套香港人主體性建造方案中留下的英治遺跡和餘孽影響。

所以，回歸後新的殖民狀態一方面要盡力維護著香港人的「非政治化經濟人」主體，亦按虛擬自由主義的構想，不強行干預香港事務。然而，新宗主政權並沒有任何一刻，鬆懈於另樹新的駕馭香港的計劃。它既透過改進英治留下的殖民政治技巧和引進新的統戰計劃，籠絡既有的和創辦新的社區、社團組織，吸納它們進入各式各樣的corporatist機制 。在原來已經殘缺不全的「半民主」議會和政府諮詢架構之內，建立宗主權力可以直接或間接操控的管治陣營，無孔不入的滲透改造港英遺下的政府架構。它也動員龐大的力量，伸手至廣闊的公民社會陣地，經營親建制的「愛國愛港」力量，從根柢開始，產造新型國家資本主義下臣屬柔順的國民身份。

很明顯地，這套新舊殖民交替的過渡方案是充滿矛盾和張力的。在它成功的全面把香港上上下下進行體制整合，產造出足夠強大的隊伍，制衡「非體系／反體系」的異見力量之前，它一直要維持某種程度的「虛擬自由主義」運作，形塑一種讓平穩過渡可以實現的共識假象。

這種共識在回歸之後的初期，仍然大體保持。可是，觸發七一大遊行出現的社會危機，破壞了運作了近二十年的過渡期共識。建基於管理主義分析方法之上的特區政府智囊也未能覺察管治危機的大爆發。23條立法、沙士危機、本地地產財團對特區政府土地房屋的干預政策的不滿，合力促成香港回歸後首度政治大風暴。零三七一是香港主權移效過渡期的正式終結，也是原來一套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基礎的「虛擬自由主義」妥協開始出現崩壞徵兆的時刻。在新宗主國的權力日漸明顯，香港以中產專業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評論，初則視為政府管治危機的深化，要求政府正視問題。這些忠諫之言要求政府採納民意，實施改革。後則察覺這並非完全是香港政府是否有改革意願的問題，而是過渡期的社會共識日益受到多方面的侵蝕的結果。而意圖回應這種價值紛亂的，就是所謂「核心價值」論述。它用以建構一種香港獨特文化的價值論述，以補救香港特區自治權的嚴重被矮化，並補償強勢君臨的宗主權力，帶給香港主體性的挫敗。可是，這種語焉不詳身份價值論述實在過於浮泛，並未能觸及「虛擬自由主義」的弊端，而且在實踐上並無任何新的啟示。

在這種虛弱的回應底下，新宗主政權顯然並沒有像九七過渡之前一樣，與中產民主派尋求共識，反而急速調整馭港策略，加快對公民社會的吸納和領導。但香港的反對派與獨立的民間組織、社運組織，卻繼續埋首於虛擬自由主義的擬象世界，沿用過去以選票收割社會運動成果的策略，繼續把社會運動視為最終由議會民主的投票去導正的力量，看不到在傳統社運之外的民眾，正蘊釀一種完全不受「虛擬自由主義」共識所能駕馭的激進化的潛力，經過幾番蛻變，慢慢已到達突破「泛民」既有政治規則的臨界點。在2006年開始的左翼和繼後的右翼本土主義運動，就是對徹底揚棄的歷程。

對「虛擬自由主義」不滿的包括：對以選票為中心的民主運動，及其妥協性格的不滿；對儀式性抗議，卻無組織壯大人民力量的實踐習慣不滿。這些不滿在天星、皇后、反高鐵等城市運動中充份表露。新的運動方式有新的戰場，也有新的動員方法，包括對既有決策、諮詢程序的「致命認真」式研究和鑽挖，也包括在公共辯論中對既有身份認同論述的挑戰，對歷史文化的召喚，例如以「本土」為視角的批判，激發了關於「集體回憶」的辯論。這些都突破了「虛擬自由主義」政治的論述困局，點燃質疑、反思、批判既有思想和實踐方式。可是，這些顛覆既定文化政治秩序的城市社運，並未完全掌握這些翻動舊共識的舉措，會在更廣泛的政治範圍內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和漣漪，以及它會打開的論述空間所造就出來的「機會」會將運動推向那方。

右翼本土主義的興起就是在這個大背境下產生。但真正讓這套論述生根的並不是表面的所謂「蝗蟲」、「雙非」這些問題，而是司徒華在「五區公投運動」前後的出爾反爾，以及他死後的「親共」歷史回憶。這些事營造出泛民陣營內及社運界內影響非常深遠的信任危機和互相猜疑的風氣，往後一切激進主義的興起，大體都可以追溯到這個造成論述真空、權威瓦解的源頭。事實上，是在這種大背景底下右翼的本土主義才能扣連出一種更激進的香港主體訴求，而這種訴求也可以和左翼分道揚鑣而採一種以鼓動「排他性」為手段的民粹主義策略，以及祭出偏離「普世價值」的反自由主義主張和直接訴諸族群性政治。

(三) 香港後殖社會共同體想像

現代政治哲學分析區分出兩種主要的政治共同體主張：其一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二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前者以具主權的自由個體為出發點去定義、思考和評價國家、社會、民族等的集體範籌，自由主義的共同體觀念視政治共同體派生於個體的利益或個人的基本權利。雖然不同的自由主義有不同的側重點，但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外乎「個人權利」、「多元寬容」、「立憲政府」、「國家中立」、「私有財產」、「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適合於設計一個價值中立的憲政秩序，意識形態、信仰、宗教、道德及美善生活、人生意義等的範籌，自由主義都一概交給私領域，每個人或每個家庭可以自作選擇。可是，期望將這些原則視為一套價值，呼召人們去保護它們，其實就突顯了存在著一些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和政治上的不利因素，讓這些「中性」的原則難以落實。所以強調這些自由主義價值，並沒有解決「實現自由主義」的二律背反，因為「實現自由主義」正正是需要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非中性中立的「能動力量」，而這正是後殖民香港主體性的未解之謎。

與自由主義相對的社群主義，指出了自由主義的盲點。他們強調了要克服自由主義下，個體被「原子化」地化約為自利的權利載體，與其他人只能建立工具性合作關係的弊病，因為自由主義失去了共同的實踐「德性」，所以要回到人的文化歷史歸屬，重新發掘道德資源，所以，他們認為要將社群放在優位。他們認為文化社群、語言社群、共同的歷史記憶等先於只擁有權利清單的個體，個體其實是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自我。他們強調社群對個體有構成性的作用，自我總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的自我。這種理論可以克服自由主義那種空白的自我觀，也否定了自由主義所依賴的普遍主義假設。所以，他們都不再程度上否定普世價值。由於社群主義強調屬於集體的文化，它有利用說明社群的獨特文化，解釋文化差異，並發展以作族群的能動性和主體性為本的文化身份論述。可是，正因為社群主義容易把文化差異拜物化(fetishized)，它很容易就可以重新滑進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或族群主義的封閉性。

上述兩套共同體的想像方式，往往針鋒相對。香港當前關於需要「本土主義」與否的爭論，其實也在某程度上有著這種政治哲學爭論的影子。

自由主義的政治共同體觀，無疑與香港人普遍的自我想像方式相似，然而香港並沒有制訂一套自由主義憲政的主權能力，而只能望梅止渴地把這套東西切割地吸收入香港人「虛擬自由主義」的自我想像中，廣泛地誤稱香港為「有自由，但沒有民主」的地方。在整個九七過渡期，這種自由主義想像和官方認可的(新自由主義)「自利經濟人」的「香港人」身份分享共同點，成為在分歧中的「大共識」。可是，這套政治文化在零三七一後漸次受到衝擊和挑戰，連帶衝擊到以政治自由主義為基柢的「泛民中產式」香港社群自我想像。把這套政治自由主義的實踐，化約為零碎、併湊的「核心價值」，正正是香港中產自由主義流於虛擬的寫照。本土主義對自由主義的中產「和理非非」實踐不以為然，也認為普世價值，包容開放不是香港族群利益所在。他們認為，以文化區隔來保護自身較優越的「文明」，亦以族群滅亡作為他們的危機論述。他們充分利用族群本質論說所可以帶來的感性挑動能力。
如上所述，這套泛民中產的政治自由主義之所以薄弱，也因為它過份地與新自由主義的自利與技術管理主義捻連難分。而且，這套自由主義論述並不是建基於香港公民實踐悠久歷史的反思，所以，它未能促使香港人從晚殖香港人主體的臨時建構中，抽取真正豐厚的古典政治自由主義視角，書寫具解殖作用的自由主義抗爭主體歷史。也就是說，這套虛擬自由主義論述 (包括其空洞的派生物，即「核心價值」說) 並沒有一個充分的，兼及理論和歷史反思的「後殖公民公民社會」掙扎成長的敘事。在香港公民運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嚴重欠缺整理及反思的狀態下，一般人對香港主體性成長的歷史認識往往非常薄弱。香港人遂容易自我想像為浮遊於各種即食的意識形態之間，失掉了反思性的主體自覺。而這亦是最近族群主義的神話式歷史觀可以橫行無忌的原因。

事實上，在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外，其他政治共同體的想像方式仍然存在。它可以幫助香港人反省自身主體想像和實踐的不足。針對現代自由主義價值真空的弊端，古典的共和論者從西方古典傳統中，反思古希臘城邦政治的廣泛參與，論證政治和公共性的優先價值，論證政治參與如何充實人的精神主體，拒絕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中的功利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政治觀、國家觀，以及缺乏社群責任面向的消極自由觀(negative freedom)。他們論辯參與政治如何構成珍貴的公民德性，並以此來形成一個能讓人實現真正自由的城邦。部份當代的自由主義者，從古典的共和主義者身上吸納養份，融合一種同時超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困局的「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公民共和主義的精粹在於既不接受一種缺乏德性考量，及能動抗爭主體意志的自由主義，也不接受預設神秘本體優先性，以族群、文化傳統、文化絕對差異性而立論的社群主義(或其變種的族群主義、民族主義)，而是去將公民實踐視為一個不斷在構造中的過程，並視之為界劃政治共同體的基本要素。簡單來說就是，既不是既予的族群文化構成一個既予的族群成員一個政治主體位置，也不是一個沒有社群責任的自由權利載體給予一個社會成員他的地位，而是在政治群體在它的成員爭取以平等的公民地位參與權利的抗爭歷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他的公民地位，公民身份，也使這個政治群體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讓其成員可以既維護亦超脫於他們原來的不同文化、語言、和宗教或其他性質的文化身份。在一個通過政治歷鍊來取得新的平等公民身份之上，形成政治共同體。他們認為，這種由在地公民實踐所組成的公民社會，才是塑造自身成為新的政治共同體的基礎。

香港後殖民主體性的建構，並不能重複晚殖時期的非政治化新自由主義主體，因為他已經被吸納到回歸後「愛國愛港者」的身份形構，臣服於權貴資本主義機器底下，只有一個沒有主體性的「身份」。後殖民主體性的建構，也不能以浪漫化的 殖民香港神話，構作一種同樣是臨時和同樣是虛擬的族群性，強說一種排他自閉的香港族群觀念，而是要以反思香港歷史進程中的公民實踐經驗出發，從香港公民社會在不同階段掙扎成長，與各種模塑香港主體的力量絞纏，和各式交疊矛盾的意識形態商議角力的歷史經驗，總結出香港公民主體性的敘事。

七一十年，香港走出了過渡期的脆弱共識，後殖主體性問題已經無可迴避。可是十年來對自身主體性的敘事，仍然停留在羅列自由主義理想的「核心價值」清單，並因為這種淺薄的策

略，無力呼應追求香港人主體性的熱切慾望，所以粗淺的族群主義就乘虛而入，以勇武陽剛的排他性來填塞這個關於香港主體的慾望。其代價就是抽空了香港人之成為香港公民的各種經驗反思，甚至摧毀了公民文化的基石，放棄了公民社會的陣地，以反公民價值的方式置代公民社會運動。

上述所說的公民共和主義路徑，是從公民實踐的角度去解構香港特殊殖民性困局的可行選擇。它要求的不是二元對立為本的加害／受害位置悲劇交換的故事，而是真誠面對香港人歷史經驗中複雜文化權力的一條可以讓自由生長的另翼進道。

《香港的主體形構》

評論：谷淑美[8] （標題為編輯所加）

很開心可以看到羅永生的文章。要進入他的謎陣才可以嘗試了解他想解構香港的謎陣是什麼。開心的地方是他與他以往的argument一直是consistent的。每一次看他的文章的時候都預期會有一定的inspiration。他對具體的現象又會有一些站定立場的分析，而且他的立場是十分清晰的。整個文章要處理的問題核心是香港人的後殖主體性 (subjectivity) 。在零三七一十年來，他覺得香港自身的主體性其實是停留在自由主義理想的框架底下，即所謂的核心價值，他覺得這個框架是沒有辦法呼應香港人今日對主體性的追求的。因此而留空了一個位置給予一些群族主義 (communitarianism)乘虛而入。這個是他的邏輯。一些十分剛烈的排他性的communitarianism我們看到出現了，並且去競逐 subjectivity的話語權。這樣一個情況，基本上其實他認為是摧毀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文化基礎。他整個論旨、立場是十分清晰的，但是他的文章卻是十分複雜的。我想簡單地把他文章的幾個部份歸納為四點，而後面我自己再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點是他回顧了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年以來的發展，他總結了一些論述，而其中可以問一個問題是 ： 究竟是不是看到一個壯大中的公民社會。究竟是不是看見了一個empowering的，或是empowered的civil society。我們一般的印象會認為這類問題十分難以回答，但是他有一個十分清晰的看法，他認為情況是：反對運動是衰弱無力，論述是處於一個真空狀態，思想是貧乏的，這是他基本的批判。那究竟為什麼? 這又與七一遊行有什麼大關係?他認為七一遊行這一類是一種浪漫化而沒有內容的想像參照，或是一些所謂嘉年華會式的一些protests的形式。這些其實是取代了人們對公民社會內部的組織及權力關係變遷等這些話題應有的關注。而用他的說法便是，這是一個虛擬自由主義的一個狀態或是自我理解。這種虛擬自由主義既不能夠使公民可以充權，亦不能夠令公民可以對自身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論以及分析，達成一個理解並依此而令社會前進。這便是他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部份，他反過來把這個現象放於一個較大的脈絡，看香港由殖民到晚期殖民再到後殖民時期，其實香港人的主體認構 (subject formation)的背景脈絡是怎樣的? 文章在這裡是比較condensed的，因為他要由過去的分析一直說到今天的狀況，但脈絡仍是十分清楚的，由過去延伸到今天。從過去 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 (作為一種自身理解的一個framework)，到後期的新自由主義，都是認為我們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他認為香港人一直都有這樣的一種自我理解 。他認為正因為有著一樣的一種自我理解，其實香港從來都是迴避或是欠缺主體性的。所以，這裡其實是十分矛盾[的狀況]，因為香港人的主體性正正便是欠缺主體性。我猜這是他想要帶出的其中一點。這個正是Hong Kong 的subject formation，但其實這是十分迴避的。

基於這整個的subject formation，如果我們要去理解或拆解當中的一些脈絡，概括性地看當中的關係，那便是過去香港人的自我理解一直都是經濟人(economic person)。不論用功利家庭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這個框架都是和應的。接著下來便比較複雜了，因為要解釋的是這種形構和虛擬自由主義的關係，中間那部份的mediation是如何發生?他認為是通過一個叫作管理主義的這樣一個ideology，或是管治模式。其實他早期的文章很多時候都會理解香港為一個managerialism。他認為正是通過管理主義這東西去mediate這個過程。而這個過程裡，當中的中產階級便會有一個自身的理解，認為他們是香港社會的一個支柱。這裡牽涉到階級的關係，亦是他下面要提及到有一個階級的implication。而整個過程是很複雜，我相信

[8] 谷淑美：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社會科學部副教授，亦為耶魯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成員。研究興趣包括公民社會、公共領域、文化社會學、城市空間、身 份政治及性別議題等，主要著作有《Hong Kong Mobile: Making a Global Population》、《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Narratives,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等。

一篇文章是很難可以解答清楚的。由這樣的mediation，後來到晚期殖民(late colonial period)，被稱之為虛擬自由主義的狀態就在一個這樣的基礎發展出來的。好了，有趣的地方是：由這裡承接下來的，即使去到2003年的七一，本來所見到的現象應該是一個所謂自我充權，看到五十萬人上街的畫面，其實他認為只不過都是在剛才的一個framework中所產生的。如果這樣來說的話，2003年七一我們往往認為是香港的watersheld。其實在他的分析裡，並不見得是有什麼watersheld的事情發生。我猜這裡的意思是這樣的，而這個是十分特別的。因為我們說起七一是一個turning point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但原來不是的，放於一個脈絡下，再理解整個問題，原來都是這樣一個大的context下發生的。在這裡，我自己特別看到他如何評論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位置，是既是有一些oppositional practices，(有他們自己對價值的追求，有oppositional practice)，但其實他們都是服應於剛才所提及的hegemonic framework裡面，在裡面有一個位置。這個便是他對中產階級的看法，由這點他批評泛民陣營，這是我理解他文章所作一點評論，也是我的第二點。

我的第三點便是：由於上面所說，泛民沒有辦法回應到很多民間新興的訴求，所以便有一些reaction。那他如何作出解釋呢? 他舉出2006年期間所出現的本土左翼主義運動，以及[繼後的]本土右翼主義運動，作為對剛才所提及的狀況的一些reactions，雖然這並不是焦點所在，但在稍後的部份是有提及到的。但是當然也會引起大家有很多問題是想要問的。

第四點是究有沒有outlet? 他也嘗試提出一個出路，在哲學的層面他覺得是要超越傳統自由主義，也超越傳統的communitarianism的盲點和限制，要找出另一條路，那就是他稱的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

我的問題大約有三個，第一個問題便是大家看不同的七一。而我想問，你用什麼理據來說明你的觀點便是一個較為可取的觀點? 如果大家對七一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七一其實有self-empowering的空間，亦有剛才你指出這樣多虛擬的成份。又如何可以總結性地去理解這樣複雜的七一 tradition? 我自己在想，例如我是作文化研究的人，都理解到行動也有其symbolic／performative dimension，而今天的protest我們接受了有很多的這些嘉年華式的元素。而這些元素其實是一些symbolic／performative的元素。其實這些元素，與後來你所想要追求的civic republicanism的ideals是否必然互相衝突? 它可否與民間社會之間發生很多不同的movement或是network的東西，去產生organic的關係。而七一只不過是其中一個platform作為一個public sphere，或是一個 public performance的渠道呢? 而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對七一的理解是否可能就更多元化一點呢。第二個問題便是你提及到本土，不論是左翼右翼... 很有趣的焦點是什麼是本土主義? 近期香港很多人也在說本土主義陣營。那如何解構本土呢? 這個本土如果是把它固定為原本，那本土是相對應於什麼來說的? 左翼本土主義是不是接近你想要最後追求的 civic republicanism呢? 還是，其實他們都是在走向一個communitarianism，較為封閉的一種communitarianism? 在你的觀察中，你可以如何理解香港左翼的本土主義的走向?它是否真能作為一個potential agent of progress呢? 或是對local的理解，究竟如何走出一個較為organic的、reflexive 的，而不是可能純粹作為意識形態，在一種很 divisive 的狀態呢？因為現在是十分divisive的。那如何走出這種狀態？你認為...究竟左翼本土主義運動的出現是不是能夠衝破了這一個限制？

第三個問題便是，你最後所提出的civic republican framework，我自己是覺得是十分可取的。雖然，這不是一個很創新的framework。他強調那種不斷實踐性、開放性。但它可以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港關係呢？因為族群主義裡面是講本土身份的，但本土性的boundary既是有一個自我界定的界線，但我們也同時要求它有一個相對開放性，那在此又如何思考一個更複雜的中港關係呢？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主體性的歷史書寫》

回應：羅永生

謝謝谷淑美細緻地閱讀我的文章。上午的討論環節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顯然有著不同的著眼點去看七一。這反映著我們因為處身不同的語境，有不同的問題在背後，所以有些朋友覺得七一有點像是一個被排斥的時刻，因為中產排斥了他們，但從香港社群 (或是一個主體性) 的形成的角度來說，七一卻是另一回事。因為七一帶出了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殖民或是解殖等種種問題。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的是一個觀察，那就是今天有很多批評本土主義 (特別是右翼本土主義) 的朋友，往往都對文化經驗有一種較為輕視的態度。

我所做的便是希望從貼近香港自身的文化經驗出發，探討由殖民地前一直延伸到殖民地後的一個關鍵問題，亦即後殖主體性的問題。並且，我想將這問題定義為香港人應如何進行自身的文化經驗書寫、歷史書寫的問題。這條道路所針對的正是我稱之為「過渡共識」 (即所謂虛擬自由主義) 失敗之後所帶出來的問題。其實在我文章最後的那數段，有一些觀念也還沒有很仔細開展，例如談到「族群性」。今天的人談很多「族群」，但究其實這些關於族群性的宣稱，都相當程度上帶有虛擬的性質。我關心的是這種虛擬的族群性如何局限我們只能夠得出某種關於香港人自身的主體想像。而我希望可以在檢討完由英殖時期一直到後殖時期的這個大歷史脈絡之後，並且由七一出發去檢視香港人的思想及實踐困局之後，我們可否再退後一步去反思一下，我們究竟需要什麼類型的主體性想像。我的疏理非常簡單粗糙。可能經不起十分嚴格的審核，但讓我姑且提出一個簡單的三分法：一個是「自由主義」，一個是「社群主義」，然後最後一個是我所提出的，較為喜歡的一個「公民共和」的路徑。如果可以用一個十分簡單的解釋，我會說「公民共和」其實是一種修正的自由主義。為什麼用一種修正的方式去重建自由主義是重要的？因為我會認為香港人一直以來對自己的文化、社會，都有一種粗淺的經驗性了解，他們都認為在香港，自由是最重要的，所以這是一個所有香港人共享的一種文化經驗。但是，這種一般地理解的自由，其實是沒有歷史內涵的。而正因沒有歷史內涵，我們看不見有一種認真嚴肅的態度去檢討香港人是如何走過來的，或者說明了他們經歷了什麼。我認為當我們要去修正自由主義的時候，這種對歷史的遺漏是要正視的。

我對七一所做的這個批判性回顧，其實是希望說出，我們其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是不太認真面對到底什麼是公民社會的問題。我在文章提到，早在九七以前我們曾經有一份叫《民間抗爭》的刊物，它內容包括理論討論，又包括把理論連結到實踐經驗，包括不同的社區鬥爭或是階級鬥爭的經驗，其實都可以用公民社會的架構(儘管當其時稱「公民社會」為「民間社會」)去把問題提出。但在回歸以後，這種工作沒有人做了，原因是整個所謂的「九七過渡」主導了香港人的政治反思空間。近幾年來我一直有運用一個叫「虛擬自由主義」的框架評論香港的問題，視「虛擬自由主義」為一個過渡期中形成的「共識」，而這種共識其實也一種霸權。我想指出的是，既然它是一個霸權，那我就要一方面認識到它是一種主導著我們的自我認識的強大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也認識到，它是主宰著我們實踐的論述。我們既要超越它，但也不能輕易地說我們可以全盤放棄它。例如說，我們現在很難隨便地說，我們要和所有自由主義的東西作對，或是說，全然想像過另外的一套東西。因為我覺得這種路徑是很難可以帶出一種能夠和香港社會大部分人溝通的論述。所以我是希望以此作為一個切入點來講一種有關於香港的主體性問題。

谷淑美第二個問題是問我如何評論當前的本土主義，我比較會選擇怎樣的本土主義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其實我也大不想要用本土或是本土主義的概念，但是我自始都堅持香港的確有一個主體性的問題存在。問題是這個主體性問題應如何開展？我希望除了哲學性的反思外，還把它看成是一個文化研究的問題。而這個文化研究的問題所問的，就是如何能夠表達香港的歷史經驗。這個香港歷史經驗的重構，關鍵是是否能避開由中英兩個主權國所主導的那一種身份打造論述。所以要回到香港所說的公民社會成長的歷史，無論是九七以前或是九七以後的。我想特別指出在我的書寫中，一直潛藏一個來自Abbas的見解，那便是香港從來都有被打造的那種身份認同(identity)，亦即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主體，這其實是中英共謀的

的產物。它從來都在是在那裡存在著，而今日那種虛擬的族群性所夢想要回到去所謂以前的狀態，例如以為殖民地那時期是較好的。這種想法其實都只不過是回到當時那一種由中英兩方共同打造的「香港人」身份。所以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欠缺身份這東西，我們欠缺的其實是subjectivity。也就是說我們應如何使用主體性這個尺度，來反思我們到底是如何抗衡權力的機制，也考慮如何與權力機制商議。這就說，當我提出要對歷史的複雜性進行回顧、追索及書寫的時候，我是試圖擺脫一個簡單的「宰制／反抗」的模型。

中港關係的問題其實是包含了在我上面的答案之內。我認為只有從這種回塑公民社會自身成長所經歷的不同類型的鬥爭，給予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一種忠於其複雜性的說法，從中疏理出一條脈絡出來，我們才可超越一個簡單的「我」與「他」的關係。因為每當我們說到關於香港人主體構成的歷史的回顧，我們是沒有可能不說中文運動，或是不考慮六四。我們沒有可能不清理和評價這些經歷，不能不從我們都是在一個複雜及不斷變動之中的條件來求出一個主體性。在civic republicanism裡，是強調一個實踐者的過程中來孕育這個公民身份出來的。我認為香港還是需要環繞這種公民身份，來建立自身主體性的形式。所以我認為我文章是用來作這樣的用途的。

Agnes另一個問題是問我在批評七一遊行的一些「虛擬性」的同時，又如何看待symbolic或是performative的那些東西，評價它們可否建立一種與社會運動有機的關係？其實我簡短地在文章說出，2006、2007剛開始的時候已經是有了一種突破「虛擬自由主義」的趨勢。或者我應該說清楚，這類perfomative的東西，我不是以一種否定的態度來個別看待的。而是要說，從整體來看，它們構成了一個我們還沒有可能真正走出來的困局。而這些performative的東西，即是在社運上使用的、象徵性的東西，可以是有機會地與公民社會的那些實踐連結起來的。當然關於那部份，其實還可以作更深入的討論。這是我的回應。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公民社會的山間小徑－從虛擬邁向真實》

文/李達寧[9]

2003 年的七一遊行已屆十年。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這十年來的香港社會？其中一個最常被學者使用的概念無疑是「公民社會」。當然公民社會有多種解釋。如果認為戴耀延佔領中環是公民社會的明確表現，那麼公民社會就順理成章包含一些自由主義價值，例如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普選。明顯是一種民主政治的願境。然而這種自由主義式的理解是否可以順利捕捉這十年來香港社會的轉變？本文希望可以從行山遠足為引子，作一種側面觀察。

2003年除了七一，亦有另一個重要事件，SARS襲港。香港人忽然明白健康的重要，亦更重視家庭。由此亦改變了許多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如果你有行山，大概會發現每逢假日，香港各處的郊野公園越來越多遊人。西貢的山路在假日幾乎是絡繹不絕。不想行山又想欣賞鄉郊美境？原來還有多個選擇：到下白泥看日落；到南生圍野餐；坐船出海探訪世界級地質公園；到大嶼山摸蜆。想再簡便點？可以去一趟濕地公園觀鳥。都去過了？自命身手好的可以參加進階的行澗（沿山澗而上）或綑遊（攀爬海邊岩石），每星期也有專人組團出發。簡單而言，香港人近年來的確開發了大量「親親大自然」的假日活動。根據筆者的個人經驗與觀察，這些活動的興起為近十年之事。

嚴格來說，這些轉變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沒有多少關係。首先，行山郊遊並不涉及政治，亦不是社運的一部份，與自由主義的政治願境無關。再而，行山亦不構成消費和商業活動。與古典的公民社會討論，以家庭以上，國家以下的工商業社會運作為內容的講法，亦無關係。簡單而言，僅為一種文化生活的轉變。

但稍為留意社會運動，就可知道行山遠足的文化有其政治後果。近年社會運動的一個新方向正是鄉郊保育。多個涉及自然環境的發展項目都遇到市民的反對。例如南生圍、大浪西、龍尾海灘，都有人在網上發起運動，組成關注組，與發展一方周旋。留意各關注組的網上文宣，可知他們十分強調這些自然美境是屬於全港市民的，是生活的一部份。文化生活的擴闊，使人關注城市的環境。部份人可能無意參與政治，介入政治社會、政黨政治，卻因為公有空間（自然美境、郊野公園）被破壞，而組織起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一部份。

這些轉變帶來什麼啟示？最明顯的當然是再次支持了公民社會過去十年長足發展之說。更多人認識到香港作為一個城市，有許多公共議題需要市民關注。這種公民社會或社會運動，往往可以集合民間的力量，抗衡商界或政府，逼使發展項目更符合法治社會下的各項條件，例如公眾咨詢、環境評估、業權釐清、城市規劃、程序公義等等。

當然，從以上所論，行山仍然是次要，重點是市民由之醞釀出更多公民參與。但本文認為可以再後推一步，從行山文化說起。行山的興起，實在道出另一個香港社會的重要轉變，就是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意識的瓦解。

所謂的「經濟人意識」，簡單而言就是相信個人努力向上，可以改善生活條件的「獅子山精神」。這種意識在八九十年代當道，被視為真理。當時，香港人的偶像是李嘉誠，嚮往的是他白手興家的故事。很多人真心相信香港機會處處，無論是什麼社會階層，憑著一己的拼搏努力，加上一點點運氣，隨時可以發達。對，是「發達」，那麼簡單的描述，不像今日的抽象遙遠的「向上流動」。當然今日重提香港故事已是彷如隔世。李嘉誠的偉大形象亦來個180度轉變，成為地產霸權的代表人物。以前人人望發達，今日做到半個中產，買一個私人單位已是萬幸。當年的民心勃發與今日的怨氣彌漫自是極大對比。個別高官或商界人士，不

[9] 李達寧：中大哲學系畢業，中大社會學文學碩士。獨立文化學術書店序言書室創辦人之一。致力建立民間與學院之橋樑，相信理論與實踐的辯證。在後回歸的香港成為一個左翼，對個人主義、精英主義深惡痛絕。

知真心還是假意，希望再用當年的神話激勵香港人，意圖消減怨氣，卻是太過漠視當年今日的社會差異。

或許我們應該反問一個問題：為何香港的公民社會要到2003年以後才有長足的發展？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商業城市，享有自由、法治的條件，為何沒有令我們早就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就此筆者大膽提出一個假設。公民社會的欠缺，皆由香港人的經濟人意識當道，而背後實由兩大條件支撐。

回溯歷史，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社會運動四起，更有武力抗爭出現，與經濟人專心賺錢的風格截然不同。然則經濟人的主流意識實乃八九十年代才建立。這種意識絕不是無心插柳，而是有意經營的結果。當時誰會想香港人遠離社會運動和武力抗爭？當然是高明的英國殖民者。從諸多討論可知，經歷六十年代的社會動盪，港英政府希望以良好的管治安撫民怨，同時又要為將來的香港前途談判增加籌碼。今日香港人所認識的現代社會制度和價值，都是七八十年代所確立的。與九十年代後期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論述不同，當年的麥理浩政府大力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無論是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基礎建設都有長足的發展；同時又致力肅貪倡廉，確立現代化的公務員制度。這些措施令香港的民生大大改善，連基層也可以感受到轉變。

港英政府故然是為了克服社會矛盾而強政勵治，但一般香港人卻沒有認為這是他們政治參與的結果。即是說，這種現代化的社會秩序純然是為政者的賜予。香港人沒有經歷過什麼政治組織和鬥爭去實現這個處境。甚至，政治組織和鬥爭只令人想起67年的左派暴動，被視為挑戰社會秩序，影響民生的行為。在好些人的經驗中，香港人只要專心搵食，社會就變得清明，生活保障也慢慢加強。這是經濟人意識的第一個條件。

另一個重要條件，也是上一個條件的重要基礎，就是由七十至九十年代的全球經濟發展。七十年代起，西方資本開始流向東亞，尋找廉價生產力。香港與其餘亞洲小龍一起，成為西方資本的工業生產中心，經濟開始起飛。這是七十年代政府可以大量增加開支，建立社會保障的條件。直到七十年代末，冷戰結構發生重大轉變，就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讓西方資本進入共產中國。自八十年代起，香港就成為資金進入中國的前線。工業慢慢轉移入中國，而商業、金融則大大加強。歷經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才成為今日所見的國際金融都會。這期間香港經濟急速發展，造就香港遍地黃金之說。香港人普遍生活水平提昇，又適逢工業轉向服務金融的發展，令很多人相信個人知識增值，的確有助個人經濟環境的改善。只要努力，無論是工作或學習，就可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處境，在當時不完全是神話。當然，同時有很多未能轉型的工人，在工廠北移，產業掏空下，就被貼上不夠努力、自食其果的標籤。

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出特定的經濟人意識。根據古典經濟學的講法，經濟人惟一關心的是用效率最高的方法去獲得財富。然則財富成為人最重要的考慮，實則亦預設了市場。既然財富是人生的最重要部份，那市場就是惟一重要的生活場域。由此觀察，作為經濟人的香港人，認定市場是最合理的活動場所。因此市場外的活動，皆被貶低或質疑。市場傳統以來當然是公民社會的重要部份。特別之處是，香港人完全漠視公民社會的社會和政治面向。原因是，香港的自由市場之建立，是自上而下的制定，香港人從來沒有以公民身份去爭取或捍衛自由貿易的權利。對大部份香港人而言，自由市場是非政治的場所。結合對共產中國的理解，以政治介入市場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共產主義，是以政治取消市場。在經濟整體向上，人人生活改善的年代，市場就被視為一個公平競爭的樂土。政治則被視為干預樂土的力量。如果有人以政治的手段影響財富分配，就是破壞公平的自由市場。結果是香港人的生活只剩下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同為市場行為的消費。遇有生活困難，不應該求之於政府，而是透過個人努力在市場中改善生活。如果市場環境轉變，就要盡量適應，而不要靠政府的干預。

不得不強調，以上的論述只是一種意識，實際的社會運作未必與之相符。例如麥理浩年代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一方面自稱不會干預市場，但另一方面則是大量增加社會保障。但正是這種看似矛盾的政策提供了「自由市場」所需要的框架，同時讓香港人相信自由市場可以獨立於政治而存在。正正是這種意識一直阻礙了公民社的成長。就算是經歷了89年六四事

件，社會出現民主回歸的要求，但也沒有轉化成普遍對政治和社會的關注。恐共的情緒帶來了移民潮，卻沒有瓦解經濟人的習慣，香港人仍然相信「搵食」的硬道理。這是2003年以前沒有公民社會的原因。

直至2003年，真正的轉捩點出現。我們觀察到由那年起，香港人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人。「政治化」仍然是一個負面標籤，但事實是自2003年起，香港政治變得激進化，抗爭文化得以進入議會，意味政治化亦有市民支持。同時大量民間團體湧現，公民社會日見強大。不可遺漏的是左翼團體自08年金額風暴大量出現；最近的碼頭罷工更得到市民同情，獲得大量金錢和物資支持。

為什麼是2003年呢？事實上，經過97的主權移交，穩定香港人作為經濟人的兩大因素已是漸漸消除。首先，在經濟環境上，香港再不像以往般整體向上。七十年代，經濟發展的確把越來越多人納入膨脹中的經濟體。八十年代開始，雖然部份人開始面對轉型問題，但又有部份港人配合西方資本進入中國，成為北進資本，靠大陸的賺價勞力進行資本累積。至九十年代中後期，其實產業掏空的情況已出現，但由於英殖民地區隔炒賣和實用市場的措施仍在，資產價格並未暴升，所以民生未至有太大影響。但至此，香港已徹底變成一個金融服務業城市。除了專業中產生及仍然膨漲的金融，就只剩下維持這個城市的服務業，產業形成兩極化。簡單而言就是一個M型社會，這是香港配合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另一個方面，社會資源再分配又面臨失敗。原本金融業賺了錢，也可以用透過政府作財富再分配，惠及各階層。但現實是主權移交後，香港政府跟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不單沒有再分配財富，反而透過高地價政策及減少政府參與，助長資產價格上升（簡單表現為高樓價，貴租金），令貧富懸殊更加嚴重。這背後有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原因，但也是成就金融中心地位的必要之惡。

在此兩大轉變下，以往對香港人甚有說服力的經濟神話終於破滅。2003之所以重要，乃是以上的惡果終於完全向港人呈現。我們再不敢說香港遍地黃金、機會處處。個人努力不見得在大環境下可以改善生活。2003年七一大遊行有五十萬人上街，即是說這五十萬人已脫離純經濟人的意識，認為遊行這種政治行動是有意義的。市場並不是惟一合理的生活場所。

經濟人意識體現為對香港人生活的種種限制。我們不碰政治，不理解藝術，連可以賺錢的文化產業也沒興趣，只因它掛了個趕客的名字。但這些自2003年後也慢慢改變過來。讀者可能認為現在香港也不見得是個文藝綠洲，爭取民主也是不見前路；但老實說我們十年前的起點比現在更低。各種在市場以外的活動開始有空間，某些抗爭性較少的就更是發展長足，如行山郊遊、有機食物、環保、以慈善立場關注基層。

在經濟人意識分崩離析的當下，香港人的確帶來許多驚喜。有時甚至令人以為「階級鬥爭」這種激進的視野也可以提上議程。（事實上它的確因為碼頭工人罷工，上了副刊的頭版。）但同時也可以令人震驚，以族群政治為口號，似乎可以動員大量群聚。用自由主義的話說，香港終於進入一個多元的社會，除了搵食和市場外，我們都願意相信不同的思想，認為那裡有崇高的價值。現代社會的諸神之戰，終於臨到。這也是公民社會的應有之義。

走筆至此，不得不坦誠，筆者乃以左翼自居，視自由主義和公民社會為思考政治經濟問題的局限。但對於這種公民社會的進展，始終抱持希望。原因並不是因為支持公民社會，而是認為這是破除經濟人意識的自然結果。惟有在這總多變活躍的處境下，左翼運動才有生機。2003年兩次大規模的罷工得到市民支持，左翼團體紛紛出現，馬克思主義者不一定是失常，這些都在在說明香港社會的轉機。

《對0371運動影響存疑》

評論：葉寶琳[10]　（標題為編輯所加）

李達寧的這篇文章當中所提到的一個重要性時刻是零三年，當時是香港人從「經濟人」的狀態轉化為「政治人」的狀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李達寧以行山遠足作例子，　指出當時的香港人開始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係，亦開始把政治帶進生活之中。除了以行山遠足比喻整個香港狀態以外，我另外發現，文章中有兩點十分重要。第一就是2003年這一個年份，其實意味著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神話的破滅，例如香港社會過去數十年一直在流傳的李嘉誠的神話一樣。李嘉誠白手興家的故事就如神話一樣，但事實上在二零零三年這一個社會流動的神話已經破滅。

在這一點上，我的印象是相當深刻的。因為二零零三年本人正剛從香港的殖民地大學——香港大學的社工系剛畢業。那一年對社福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時刻，但其後我發現這一重要時刻其實不僅限於社福界，對於許多界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為何重要呢，因為在零零及零一年度期間，政府通過了一筆過撥款這一項政策，亦正是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正式實行這一刻措施。縱然當時社會充斥著不少反對聲音，但這政策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其實並未有即時展現出來，卻是在往後幾年才慢慢的展然出來。

另外在2003年出現的另一年重要事件，就是副學士——一個教育商品化的情況出現。副學士都是在2000至2001年年度出現的，也是董建華在任內推行的政策之一。此外第三件事就是「孫九招」。「孫九招」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政策建議，當中比較重要的便包括了譬如停售居屋及撤銷租管等政策。其實也由於這些政策造就了地產霸權能控制香港的整個供應。亦由於這個轉向讓新自由主義成功被引入香港。而這種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從2003年開始逐漸明顯。

李達寧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香港普羅大眾在2003年以前，一直都是以一種經濟人的狀態為主。經濟人這一種身份狀態的確立其實是因為過去香港的民主自由的發展一直都是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模式存在。這不單只限於麥理浩年代，當中也包括後來的彭定康年代。文中並未有提到彭定康，但我也把彭定康年代包括在這一次討論之中。因為彭定康的重要性在於，他提出的政改方案，不論是在八五年之後，或是八九年之後，都是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政策設計模式推行。在這一過程之中，群眾並未有透過自身參與——以一種由下而上的方式推動香港民主自由的改變。

這種狀態形成香港經濟人狀態的發展。香港人相信，自己可以靠雙手白手興家，而民主自由等則是由上而下的方式安排。香港人並未有經歷由自己一手一腳爭取民主自由及推動改變。群眾運動中能勉強稱得上政治事件的就只有六七暴動，或者八十年代曾發生過的大型居民運動。但是這些運動與政治的連結都是比較少的。例如油麻地艇戶事件、天台屋等議題，又或是公屋富戶政策等抗爭運動，也是相對少與殖民地政府及政治性等問題連結起來。因此李達寧在文章中，以03年作為一個由經濟人轉化成政治人的狀態的分水嶺，也是在這分水嶺中，見到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經濟惡果。我認為，這一惡果其實是基於剛才所描述的因為經濟大環境的轉變所導致的一種惡果。從李的文章中可以見到，他有相當大的勇氣，他對這一大經濟發展作出了詳細描述。我說他有勇氣是因為依我經驗所見，許多寫文章的朋友都未至於膽敢為這一大經濟作出這樣的一個判斷。但是李達寧卻在文章中對香港發展作出了這樣的一個詳細描述。

但是對我而言，我並不認為生活政治的展開是在03年。希望李達寧待會也可對我這一個觀點作出回應。對我而言，相比03年，我更認為08年反高鐵運動才是真正在生活政治、人與自

[10] 葉寶琳：曾參與及策劃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反高鐵及反國教等社會運動，希望推動進步本土觀。讀過社工，教育，文化研究，現職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

然及土地之間的關係發展上有一突破。我希望在這一個觀察上多聽一點李達寧的看法。但是，即使我覺得08年才是突破，03年仍然是一個十分有意思、值得引申下去的一個討論。例如「七一回歸十週年」，這三組詞語本身已經十分值得討論。例如談及回歸，好多時候好多人都沒有留意，我亦儘量避免，就是當討論回歸，有九成九都是指涉主權移交。因此大家都儘量避免談及回歸這一字眼。但是，相反來說，十週年這一字眼，卻似乎依據馬國明馬老闆所說，是把那一套官方的那一種要解決百年屈辱的官方意義，轉化成屬於香港人一套的本土化意義。

首先需要重提一點，其實七一遊行並不是自03年才開始有。03年以前，每一年七一其實也有示威，每一年也有遊行。但依我的記憶所及，在03年以前的遊行當中，更有一、兩年的遊行主題與主權移交完全無關，卻是關於六四的。其中更有一年的七一遊行是以平反六四為主題。那是直至03年以後的七一遊行才開始有另一套意義出現。當然，在當時的遊行主題上，仍然十分抽空，人民也是十分抽空的概念。直至現在十週年，不論是指涉中產階級也好，又或是公民社會的發展也好，其實這些指稱都是不斷地被重新賦予另一種意義。

但是對於我來說，作為一個具有前線運動經驗的人而言，03年的運動發展到底意味著什麼意義呢？我認為，其實我們是沒有必要去把公民社會浪漫化的。正如當年，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了一、兩年，0371的時候我才幫遊行當糾察，在曬太陽，當時我留意到，其實每一個界別，他們會各自在不同的地方集合，然後又與71的遊行大隊伍一齊遊行，然後又會舉辦不同的記者會以表明不同界別對23條立法的反對立場等等。而我疑問的是，這一種「百花齊放的」狀態，在遊行完以後是否能延續下去並因此壯大了整個「運動」組織？當中的不同小團體，又是否能夠或有多少能在03年71以後，成功地延續下去？

在傳統公民社會發展上，我對0371的影響始終是存有疑問的。但我發現，能成功發展出實際意義的卻是在網絡政治上，尤其是04年名嘴封咪事件之後。正如馬老闆有提到的，尤其是在主流傳媒的闡釋之上。對於我來說，0371所帶來的最重大的意義就是在當時遊行之前，多了許多人自發地在利用網絡媒體去組織並發起一些行動。我們發現，現在許多行動的發起都不再需要倚靠主辦單位的力量。許多人只是憑自己的力量，用自己方法都能做到。當時還未有什麼社交媒體，但是不知大家還有沒有印象，例如網政21，或者sosick.org等網上組織出現。例如sosick.org就是一個由三位大學生自發建立的網站，他們收集了沙士疫症大廈資料後，再把這些資料放到網上，以回應當時政府始終不會把疫症大廈名單公佈予公眾的做法。在這三個學生自發建立這個網站的一個月後，政府終於接管了這一個任務，開始肯去公佈有沙士疫症的大廈名單。網政21則是透過Outlook Express來去瀏覽pps。但是始終sosick.org就正是一個自發地、自行透過網絡媒體來發展的一個網絡政治的好例子。除此之外，在當年名嘴封咪之後，不論是網台還是In-media，都是03、04年網絡政治發展的一個延續。

另一方面，對於傳統公民社會的團體發展來說，0371之後，是怎樣的抗爭精神得以被延續呢？又或者我們延續了一些怎樣的組織力量呢？面對今天，例如去年的反國教，我覺得我們是時候也有必要好好反思一下，我們到底有哪些方面進步了？例如在行動的動員力上，我們似乎是增強了；但是組織能力又是否有所增強？反觀我們現時的組織力，似乎和以往相比還是差不多。因為這個狀態，我們好多時候都會傾向依賴主流及網絡媒體作動員渠道。當然，現在當主流媒體的記者都是通過Facebook「收料（取材）」時，我們又有必要問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通過網絡，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到底我們的位置是主動了？還是變得被動了？

正如在剛才的討論中就有提到，0371對於官方而言，是主流媒體幫市民創造了歷史，但其實只是迫使北京更加控制香港。這些都是最近一、兩年我不斷思考的問題。尤其雙非問題，其實我們都很明白，雙非問題是因為03年CEPA而引發出的一個問題。但這又是否代表我們要去否定0371運動所帶來並延續下來的抗爭精神？所以問題應是剛才所提及過的，人民到底是什麼？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空的人民意義到底是在召喚，還是令我們更加困難地去收割呢？收割的意思是當0371或人民，這些講法我們沒有賦予它們意義及內涵的時候，那麼那收割的成果就只會變成「北京僭越董建華」作為我們運動的成果。但是這一成果又是否是所

謂人民所希望達致的一個目標呢？又譬如，我們去討論基層問題，其實基層市民又是否希望董建華下台呢？可能事實未必如此。

所以，我們更要問的是，假使在十年後我們再去對照反國教運動時，在討論之中所談及的抗爭精神，其實是否會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什麼不同？例如中產階級的描述，就本人而言，現在的抗爭與 0371 時的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為解殖提供入手點》

回應人：李達寧　（標題為編輯所加）

其實我所思考的問題並不是從七一開始的。因為我對七一的理解，是相當偏向一種公民社會的理解。亦或許如葉寶琳所說的，是有點過份浪漫。當然，我亦同意自零三七一開始，民間社會的興起的確越來越旺盛。但是我更關心的問題是，我是否一定要以本土為討論的核心？我其實是相當不喜歡本土這一術語。因為我自覺為一個左翼，本著國際主義的立場。本土這術語一定有保守性。我說它保守，是因為這一個狀況好難避免。尤其現在有陳雲的理論。

我曾多次說陳雲是否是一種保守主義？剛才已經有人提過，他所追求的香港，就是要保留原有的自由流通的金融制度，回復英國殖民地時代政府的大量福利政策，以及提倡市場區隔，及讓普羅大眾都住在公屋，避免他們進入私人市場，遏止炒樓情況出現等等，以之建立香港城邦。陳雲的這套理論其實只是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未全面新自由主義化之前的香港圖像。

唯一比這圖像多的，就只是他建議要在這圖像上加設一個門檻，以確認進入這門檻的都是香港人，以測試想進入這門檻的人是否足夠本土。足夠本土的人當然是可以進入香港，不夠本土的人便應該被驅逐開去，或進入難民營或被驅離。但是，其實這門檻的設立只會造成大麻煩，就是我們該如何決定誰是香港人？然後，陳雲旋即訴諸一大堆文化經驗，例如是否寫簡體字？是否操廣東話？會否隨便在街上大小二便？就是通過這些說法來排走一部份人。我認為只有涉及這種本土，我們便難以避免要做區隔。但涉及區隔又必然生產出一大堆奇怪問題。這可能偏向國際主義，但是我覺得這種區隔最後都是指向一些資源的分配。規定了那些人可以住在香港？可以享用香港的街道？以及能過這種我們覺得很不錯的生活。台灣有個詞話叫「小確幸」，指微小而確實的幸福。我覺得現時香港人都是想保有這一點小確幸。香港人只想逛街時街道不是全變了金舖，而是有我熟悉的小店，以及我熟悉的茶餐廳，或其他不同的生活細節。的而且確，這種生活細節當遇到內地人湧入香港，無可避免要消失。

因此，一種本土論述就出現，抗衡這種改變。當然，背後是有一種realpolitik。有一個判斷是，動員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其實早已行不通。所以就要以共產黨來嚇香港人，嚇到香港人都害怕起來，香港人才會走出來上街示威及抗爭。陳雲自己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要以這一恐嚇手段以聚集民氣，並只有這樣才可擊退共產黨。但是我就認為這種聚集民氣、擊退共產黨其實就是要訴諸於對自身利益的堅持，對既得利益的擁抱。

此時此刻，我認為應該追問香港為什麼今時今日能成為一個國際金融大城市？背景成因是怎樣的？我覺得好多時候有好多主張都是把背後的歷史給遺忘了。為什麼香港的經濟如此發達？第一是因為七十年代歐美資本主義開始沒落，西方國家嘗試衝破自己的框架而去尋找海外的勞動力。這是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其中一個原因。然後至八十年代，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冷戰的格局改變，令外國的資本得以通過香港進入大陸，香港因而成為資本的橋頭堡。亦因此造就了香港這樣的金融城市。我曾在另一場合提過，這一種香港的「小確幸」，即是現在這種有錢又可以保有生活的狀況，其實是因為背後的因素條件，香港的這一段背景歷史。其實我們都是殖民地的買辦，然後才讓我們可以享受到這些。

然後至今時今日，假若我們仍要去堅持本土，其實我們必須要問，我們到底在堅持什麼。陳雲是一個好誠實的本土派，我們就是堅持要錢不要人，我們只要大陸的錢，但就不要大陸的人。我認為這明顯是一種虛偽，是對本土歷史的漠視。上星期我去了一趟台灣，被問及同一個問題：「其實香港和台灣都不差很遠，難道香港人的錢不是從內地賺回來嗎？為何現在有部份人可以主張中港區隔之餘，卻又繼續和內地有生意往來？」到底是如何一方面堅持中港區隔，另一方面又繼續佔據資本主義橋頭堡的地位？坦白說我當然認為那是行不通的，在邏輯上也說不通。但是又是否主張撤銷邊界？但這也不是我的立場。

似乎這裏岔得有點遠了。但是我們可以從這背景上嘗試理解陳雲所提出的那一套本土的出現到底是什麼意思？亦必須要提出，當任何人討論本土的時候，解殖又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認為陳雲的理論是一套極端的殖民主義。基本上他就是要保持那種殖民買辦的身份，回到七八十年代。我認為對於陳雲理論的解答方法應就是解殖。但是解殖是應該怎樣做呢？我在這裏就引用台灣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教授所提出的去帝國。解殖是不能離開去帝國這一議題來討論。甚麼是解殖，當中指涉了我們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脈絡之中的一個部份。因此，若我們要解除我們身上的殖民結構，我們就必須要解除這一種帝國主義的結構，否則我們只會成為另一個帝國，然後去剝削其他人。這一種殖民是永遠無法拆解，這一套說法當然是源自陳光興教授針對台灣的討論而來，因此背後還有好多其他不同的支節。當然陳光興教授的理論與其背景不是我這次的討論重點。但是我想提出的是，如果我們要進行真實的解殖的話，就必須意識到這個背景。

然後解殖怎樣做？是否要撤銷邊界從而吸引大量的內地人來香港？這當然也不是我的立場。在某程度而言，我承認realpolitik是存在的，但陳雲的一套絕對不是realpolitik。因為那是行不通。我們不可能一方面與之有貿易往來，但另一方面又驅趕他們離開。這是相當不合理的。除非能做到連資本的連繫都中斷了，再重新理解小確幸是什麼。小確幸不一定是中產生活，不一定要如好多現時的香港人般要買有私人會所的私樓，平日閒暇是要去high tea。假若我們重新尋找生活的話，就不是要從這些東西上尋找了。我們要擺脫在殖民地時候已經種了在我們意識內的例如發展主義之類的想法。我們要問，經濟發展是否必然比所有事情都來得重要？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好似是傾向不相信這些經濟主導一切的想法，但是只要回到日常社會，假如我們向公眾主張放棄發展經濟，以建立香港，這對好多港人來說都不是合理的事。一般人難以理解什麼叫做建設香港同時放棄經濟？但這偏偏就是我們應該嘗試去推動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在這過程裏面假如我們放棄這一種無道的經濟發展，即是那一種把所有東西都打通，把所有資本引入的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話，那我們就會接受一個立場，就是拒絕成為大陸資金向外流的一個關口。我們應該拒絕再去服務內地這一種金融資本主義。

這是需要一點歷史作前題的。當中國入世之後，其實中國所掌握的資本是相當的巨大，但同樣地其內部的政治危機也在增加。但內地是如何去抒解這些問題呢？現在內地的做法是通過資本向外流，通過投資以重新充實內地的金融流動。如果我們能留意到這一關口，我們就會明白其實香港在這層面上是相當重要。我經常有提到，香港人總是不明白自己的角色對內地來說有多重要。香港的重要性不僅僅只是賣奶粉或提供雙非床位給內地人，而是通過這一種金融資本的地位，那是對內地而言是不何丟失的、缺少了就可能導致內地爆煲的一個重要關口。我們必須要認識這一問題，這樣方能為香港的去帝國、解殖方面提供良好的入手點。

因此，我們要阻止香港繼續成為大陸資本向外流的關口。這些都牽涉了許多民生發展的問題，要作許多規劃，例如填海，或建立金融發展局、或扶植一個服務共產黨的政權等等，然後去瓦解及排走那些英國及美國所種下的釘。正如我們經常會聽到內地官員形容香港人為「人心未回歸」，這的確是事實。許多香港人均十分推崇英美的體系，例如我們經常會把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等放在口邊。對於內地來說，我們甚至乎就是眼中釘。當我們提起這些價值，便反映了我們還只是殖民地的走狗。因此，每當我們越要提普世價值，內地的態度便更不屑。這是內地所仇恨的，因為就是這些意識，對內地的立場來說，就是令內地的資本始終未能十分掌控香港金融中心的一些障礙。因此內地總想設法把這些排走。亦正因如此，當我們要重新思考解殖、思考本土的問題的話，我們更應該從內地的這一個立場去思考、去拆解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而非如陳雲的方式進行。我暫時先說到這裏。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